

性革命

——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美国百年性史

(注1)

何春蕤

摘要

情欲领域中的急速变迁跃动，是顺应资本主义的商品化趋势而将身体进一步性化？是中产女性以改良式的情欲解放运动来延缓并漠视基层女性真正的革命需要？是情欲优势女性模仿或复制男性欲望以扩张自己的情欲版图？这些夹带着价值判断与各种化约论假设的问题，需要历史的、社会的具体复杂分析来加以回应。本文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架构，整理厘清各家丰富错综的历史叙述，描绘出美国近代百年的情欲革命史，显示所谓情欲革命的意义在于情欲生产力与情欲生产关系之间的张力如何被社会运动凝聚转化，被情欲边缘人口用来改变抗争的基点、累积新的主体养成资源。在这个意义之内，性革命已不能被简单的成功失败评断所化约，性革命的历史和运动分析是进一步改变社会的必须。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这段话带着一股极强的必然性，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激化矛盾就是社会革命发生的契机。这个分析方式固然提供了理论架构来思考社会革命的发生条件，可是它似乎也暗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彼此独立的整体，各自有其

颇为统一的性质和内容，因而在两者之间形成矛盾也是颇为容易理解和观察的事情。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图塞（Louis Althusser）在写《捍卫马克思》（*For Marx*, 1969）的时候为这个架构做了一些补充。他引入了一个借用自佛洛伊德的概念，也就是「多重决定」（overdetermination），细致的说明社会革命的发生是因为许多「来自不同源头、不同意义、不同层次和施力点的矛盾」——其中有一些甚至是极端异质的——在历史际会的时刻同时积累于同一场域，融会成为一个爆发的整体，因而形成社会革命（100）。阿图塞对多重决定的说法显示，是诸多异质矛盾的社会力在某个社会场域的际会，互相影响，互相运作，形成革命：这个说法在上层／下层单向决定论（determinism）的二分模式中开辟了更多的复杂空间。同时，多重矛盾的聚积和汇集虽然听起来是偶然的、自然的发展，但是其中仍有其必然性：「它们在『融汇』成革命式爆发时所构成的整体（unity）是被它们的本质和效应构成的，也就是被它们各自运作的特殊模态所构成的」（Althusser 100）。换句话说，阿图塞认为即使是多重异质的矛盾，也会在一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必然汇集成「整体」，形成革命。以二十世纪 1990 年代的眼界而言，这个具有某种统一性质的整体已不必然具有什么实证意义，诸多异质矛盾的社会力也不再轻易的享有不言而喻的融汇倾向，但是作为一个充满启发性（heuristic）的思考架构，阿图塞的分析模式在捕捉历史的某些际会时刻上还是个可用的工具。

比较不为人讨论的是，早在阿图塞之前，奥地利的佛洛伊德—马

克思主义者赖希（Wilhelm Reich）就已在其名著《性革命：迈向一个自律的人格结构》（*The Sexual Revolution: Toward a Self-Regulating Character Structure*）中（注2），尝试对马克思的理论做另一种宽广的理解，也就是把有关社会革命的结构分析运用到性的领域内。赖希和所有的社会建构论者（social constructionist）一样，认为个人的性欲强度及需求性质总是在「性」的社会发展中逐步形成的（Reich, *The Sexual* 17），婚姻则是最主要规范情欲的制度。他也观察到，在他所处的历史阶段中，性——不管作为观念或实践——虽然已经发展到无法在既有婚姻道德所允许的关系中得到满足，但是婚姻关系中（许多）妻子和孩子在经济上的依赖位置却仍然要求婚姻道德继续巩固，以维持婚姻制度的存在及其所提供的保障。而另一方面，（某些）妇女和青少年因为劳动民主化而得到机会参与生产工作，在经济上逐渐向独立自主迈进，在生活方式和情感心理上也倾向更多样的需求，婚姻家庭制度内那个强制要求的、一向极为有限的情欲运作通路因而凸显出其威权的本相（注3）。这两股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形成的根本变迁一旦汇集，就使得情欲的需求和婚姻家庭的道德之间产生了基本的矛盾，赖希认为这就是性革命的时机和条件了（Reich, *The Sexual* 152）（注4）。

赖希的历史眼界当然没有给他机会像 1990 年代的情欲政治（erotic politics）研究者那样细致的认识「性欲强度及需求性质」中包含了何种复杂多样、与主流道德对立的内涵，他所说的「性革命源自婚姻制度的紧张矛盾状态」似乎也太简化了社会变迁过程；不过，以下本文将透过对 19 世纪末以来美国两次重要的性革命的历史

分析，初步显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特别是透过我对赖希和阿图塞的运用和补充——在情欲领域中的可能操作（注 5）。我想要说明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在解放劳动力的同时，因着一些历史际会的原因而在商品化的过程中创造愈来愈明显的情欲发展与多样化，也就是我所说的「情欲生产力」(forces of erotic production) 的大幅增加，以致于和原本规范情欲运作的「情欲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erotic production)——现阶段最主要的体现就是一夫一妻父权婚姻家庭和异性恋体制——形成强大的紧张状态（注 6）。这种紧张状态不但表现为情欲活动日渐升高的可见度，更带动各种情欲论述展开意识形态争霸战，为各种运动主体创造介入施力的可能——这些激荡的汇集就是我所谓的性革命。

在理论的层次上我也想指出，情欲生产力在 20 世纪的发展当然和资本主义生产及其带动的人口流动和欲望创造密不可分，而且情欲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形式也极可能纠葛了既存的其他权力网络（如性别、阶级、族群、年龄、性口味等）。但是这并不表示这个情欲生产力的跃进就全然只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或者必然只会加剧其他不平等权力的运作而已——提出这类结论的人不但低估了社会力的矛盾复杂（也就是高估了宰制权力的彼此配搭合作无间），同时也蔑视了权力弱勢的主体和她们的运动实践在此过程中的各种可能壮大施力。

事实上，在本文的动态结构观点中，情欲生产力和情欲生产关系并不是什么固定明确的两块铁板，而是情欲的不同呈现与沉淀在特定历史时段中展现出来的紧张及对立。因此，某些在此刻被视为体现情欲生产力开拓跃进的实践和论述，固然可能和那些体现当下情欲生

产关系的实践和论述形成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战，但是这种紧张关系或者敌我的部署并非绝对或固定，它们都可能在进一步的挪用串连中形成新的位置和关系，而且新生的情欲生产力若能在某些有利的条件（如基进社会运动的介入）之下扩散沉淀，争取到自我再生产的机会，就有可能重织情欲生产关系的经纬，甚至介入资本主义主体再生产的途径和性质。毕竟，傅柯所谓的「性部署」（*deployment of sexuality*）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总是在各种社会力的激荡抗争中流动变换的（注 7）。另外，性革命对于更广泛而根本的社会革命有其深刻蕴含，我将在结语中提出赖希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以破除此刻反控氛围中一般人对美国性革命过分简单轻蔑的评价。

在本文的理论架构之内，性革命并不是情欲实践被整体的、单一的、彻底的翻转或全面取代；相反的，它是情欲模式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段中——被观察到、被大量关注讨论——的多样化发展，这个多样化的增长速度和幅度使得性的运作方式、具体实践、论述说法、甚至相关情绪反应，都一再突破原有情欲体制的决定或局限，这就是性革命的征兆。同时，本文对性革命的历史分析也将指出，性革命的方向、幅度、以及它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冲击，深刻受到基进社会运动的介入影响。因此，我在论述性革命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关注多重异质的、在性领域中各有其特殊运作动力学的权力关系如何相互竞争、操作、冲突，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也仍然保留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样的分析工具，以作为介入论述的切入点，希望能串连不同的抗争，拉出一条松散但确定的反对战线，在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前提中不丧失对立政治（*oppositional politics*）的眼

界。

I

研究性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者们多半同意（注 8），美国近代史上有两个时期呈显出极大的情欲模式变迁，也就是我所说的「情欲生产力」和「情欲生产关系」极为紧张的时期，一个是 1880 到 1920 年之间有关性道德和婚姻的重大转变，另一个则是 1960 年至今弥漫西方的性革命（注 9）。这两次性革命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之内都已形成重大的影响，深刻的改变了家庭、婚姻、爱情、性、堕胎、求偶、同性恋等等的文化面貌及实践，而这些具体的冲击和改变并不是「成功」或「失败」等等简单评估可以捕捉的（注 10）。或许运动者更需要做的，是深入研究这两段历史，以便寻找可以在现有脉络中使用的思想及运动资源。

虽然史料极为有限，常常要依赖口述流传的个人经验和观察，或者只能从一些政治决策者对社会现象的忧心记述中侧面推敲，但是研究者几乎都同意，最明确标记出 19、20 世纪之交的性革命的，就是过去在情欲双重标准之下饱受限制和监控的女性。19 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转变以及伴随而来的家庭功能变迁，很明显使得女人的社会定位有了极大的变化，女人有了更多的人生选择，逐渐有机会和能力脱离以婚姻家庭为主的依赖关系和生活空间（注 11）。引人注意的是，当时（未婚的）女人开始有经济能力和机会发展新的属于她们的生活文化时，由于一些很重要的历史因素的际会（详见下文），使得「性」成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并在开发情欲的过程

中形成了松动原有情欲关系局限的趋势。这也就是说，「某些女人【在当时】之所以选择进行比较随便的情欲模式，这必需要透过那个更广大的塑造其性文化的阶级关系和性别关系来理解」（Peiss 132），而不能简单的归纳为「女人的经济独立」而已。

促成世纪之交美国情欲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很明显是当时资本主义大幅扩张时所带来对家庭结构的冲击。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劳动力的需求，年轻劳动人口开始流出原有家乡的人际脉络，进入新的都会空间，单身的劳动者大量集中到工商业都市的周边，在逐渐增多的临时居住空间（如 YMCA）或者供膳宿、混合性别的寄宿型住家中找到居所，以便在当时新兴的工厂、店铺、和百货公司就业（Seidman, *Romantic* 67-68）。在这些外在于家庭或社区人际网络的流动生活空间里，年轻的劳动者开始建立新的人际网路，原本被父母、教会、邻居、学校主导的求偶模式，渐次被自主性愈来愈高的交友方式取代，年轻男女在尝试和摸索中社会化，逐步发展出在她们父母和社群控制之外的情欲关系和模式，而且由于多多少少摆脱了原生家庭和社区的监管，她们对于不合道德常规的性活动也有较高的容忍度（D’Emilio & Freedman 228），这种自在和自由形成了情欲生产力蓬勃发展的有利环境。

在另一方面，年轻劳动人口的流动和集中居住，以及新的年轻生活形态和经济实力的形成，很快的回头为当时正在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提供开发新型消费的诱因，以便吸收工资回笼。新兴的消费事业重新定义原本在家庭脉络中进行的闲暇活动，把工余的休息转化为在商业领域进行的休闲（Freedman 38-39），而为了呼召年轻的消费

主体，这些休闲事业多以一向最被成年人垄断的「性」为最主要的卖点，进而促成情欲生产力的大跃进以及情欲生产关系的多元化。

众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当时在都会区出现大量像舞场和俱乐部之类的新物质空间，首度标志了陌生男女已经可以借此聚集并互动调情，这些新空间则把工作之余的休闲呈现为勾动情欲的特别节目与活动形式，以便吸引下班以后无「家」可回但是又无事可做的年轻单身消费者（D'Emilio 及 Freedman 195-196）。在这种充分激动而鼓励的空间中，年轻的消费者相应的自发创造并扩散新的身体经验，刺激新奇、两人配对、摆动身躯、密切接触、充满情欲暗示的动感舞步，取代 19 世纪那种老少皆宜的制式集体舞步而成为流行；同时，从摆动臀部到身体接触到拥抱等等充满性暗示的动作，也直接雕塑出新消费主体充满情欲活力和诱惑的身体（Seidman, *Romantic* 71）；各种新兴的「钓人」据点出现，更凸显情欲的波动已经在这个阶段成为休闲活动的主要触媒（Peiss 128-129），交际的需求甚至带动其他新型娱乐场所的兴建，世纪之交开始出现的大型游乐场（最出名的例子就是纽约附近的 Coney Island）就以各种刺激惊险的游乐设施来直接提升感官的刺激，并以各种耸动情欲的广告来间接鼓励陌生男女在搭乘游乐设施的紧张过程中顺势进行身体的接触（注 12）。同一时期开始出现的电影院则提供了黑暗的自在空间和银幕上具体的情欲形象，供情侣们边看边学，在后段号称「情人道」的座位中探索情欲的极限（D'Emilio & Freedman 196-197）。

以上这些以情欲为主要焦点的空间硬体及活动形式同时在世纪之交出现、普及、和扩张，不但标记了情欲的可见度和强度大幅提升，

凸显了情欲生产力的迅速扩张，同时也显示身体情欲协商模式的重大转变，逐步超越原本由父母和宗教道德主导的交往范畴，代之以随着资本扩张而大幅提升的情欲强度与多样性。人口的流动聚集、因就业而延后的婚龄、情欲的扩张和平常化——这些变迁都在情欲生产关系中引进更多变数，创造了更多空间和资源，边缘情欲形式因而得到发展成熟的机会，使得不婚和同性恋在这个阶段首度成为个别女性在婚姻之外的人生选择（D'Emilio & Freedman 190-193），并且在纽约哈林区和格林威治村等少数特殊地点成功的形成明显可见的同性恋文化及社群，借着周遭情欲生产力创造的开放空气而自在发展（Faderman 67-92）。

当然，即使在这些边缘的情欲社群中，情欲生产力的跃升就个别主体而言也有不同的意义和实践空间。具体来说，未婚的年轻就业人口虽然在经济上证明了自己有生产力，但是在操作这种经济能力以满足自我的物质需求上仍然受到既存的性别、代间权力、阶级等因素限制（注 13）。例如，女性劳动者的个别阶级位置往往影响到她们情欲实践的能力，有些中产女性因为受过大学教育，就业机会比较好，经济能力比较独立，因此比较有本钱选择终身不婚或采取被称为「波士顿婚姻」（Boston Marriages）的公开同性同居；无产阶级女性的同性情谊则多半以一人扮装为男人，来制造异性同居关系的形象，以避免人言（D'Emilio and Freedman 188-194）。另外，代间与阶级位置也在女性情欲空间上形成复杂的影响。劳动阶层女性的工资有限，而且仍被视为家庭整体收支的一部分，除了日常生活的必需之外，绝大部分工资要交给父母以贴补家用，这么一来，她们面对各种流行的消

费形态时所能使用的资源就很有限。在这种欲望与实力的大幅差距状态之下，以性作为某种交换，蔚为风气（注 14），劳动阶级的女性可以主动以当时流行的、但是与妓女大为不同的「甜头女郎」（*charity girls*）的方式，用不同程度（除性交之外）的身体开放，来换取男人招待她们享受新兴的休闲娱乐，但是也因此在其中开辟出比中产女人更大的情欲探索机会（D'Emilio & Freedman 198-200；Peiss 134）。

II

情欲生产力的大幅扩张一旦形成以上所显示的可见度，并向情欲生产关系的疆界和底线挺进，就难免引起另一些社会力的骚动。1860、70年代已经开始对情欲生产力逐步增长的强烈关切，首要表现为由一些性主流妇女主导的社会改革运动。例如，「社会卫生运动」（*social hygiene movement*）与「纯净运动」（*purity crusades*）就在此动荡时刻合流，希冀透过宣扬文明的道德观来教导维多利亚式的自制，并消除性病及其传染媒介——妓女（Seidman, *Romantic* 72），以维系既有情欲生产关系的稳定；她们也呼吁政府消灭红灯区，并用透过婚前验血、性病病例强制报告等等措施来加强对性的管理（D'Emilio & Freedman 205）。这些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成功的把红灯区赶到性主流妇女视野之外，进入劳动阶级、移民、和黑人的居住区域，因而大量增加了劳动妇女（即使短暂）卖淫的机会，更为后来进一步扩大扫黄提供了正当理由（Peiss 132-134）。

值得注意的是，当阶级意识在这种张力中凸显时，「性」也开始逐渐成为身分认同的一部分（注 15）。换句话说，不但阶级可以透

过性来反映其在社会资源和权力上的差异（某个阶层的人才可以得到或享受某种性），同时，性本身也渐次成为构筑阶级的文化范畴（表达或拥有某种性才算是某阶级的成员）（Haag 165）。因此研究者注意到，20 世纪初新兴中产阶级女性定义自我的方式之一，就是透过各种行动和论述来显示自己的情欲是道德自制的，与当时普遍可见的妓女或淘金女郎商业化了的情欲截然有别。即使在进行与传统有别的情欲探险时，中产阶级女性也强调自己是有意识的「自主情欲」，而不是像基层年轻女性那样心智不成熟，晕头转向，无法掌控自己的性，更不像基层年轻女性那样物质能力太弱，以致于拜金虚荣，只能盲目顺从情欲市场的逻辑（Haag 165）。中产阶级对自我情欲的这种定位与期许，一方面推动了各种健康卫生或净化的改革运动成功的操控社会舆论，另一方面，也常常表达为对基层女性施恩式的保护心态，反而形成对基层女性主体的另一种管制与阶级压力。

在这里我们看见情欲生产力和情欲生产关系在世纪之交形成的拉锯战，而正是这种拉锯战在性文化中形成了意义和实践的移位及转化，才使得我们注意到性革命的征兆。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扩展固然推动了休闲与情欲的结合，提升了情欲的生产力，而随着消费生活形态的扩散，新兴的消费道德也继续鼓励充分享受愉悦，追求自我满足——包括在情欲方面的享受和满足（D'Emilio & Freedman 234）；但是，同时在这种突破各种原有权力和欲望疆界的氛围中，情欲生产关系也因为与其他权力关系以及整体文化生产关系的共生而必须采取一些维系本身稳定的努力，也就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中产道德净化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这种稳定局势的努力，世纪之交的进步社会运动也发动了新的性政治，不但为（已婚）女人争取节育的权利，也在无意中间接的为未来发展并推广更普及、更方便的避孕措施准备比较有利的环境。随着都会的形成以及其所带来的人际关系复杂流动，美国政府原本在 1873 年设立「Comstock 反色情法」，严厉禁止避孕资讯和工具的公开販售或宣传，拒绝让女人的身体和人生脱离生养重担的阴影，世纪之交的社会运动因此把这方面的解放视为重要目标。1910 年代前后的基进运动份子（特别是艾玛·勾幔 Emma Goldman 与维多利亚·伍德尔 Victoria Woodhull）、劳工运动领袖（如尤金·戴普斯 Eugene Debs）、进步记者（如约翰·瑞德 John Reed）等，都相信社会解放必然包含身体情欲的解放，因此大力鼓吹「自由恋爱」（free love）（这里的恋爱事实上指的是性），积极反对制度性传统婚姻的相互责任制及生殖目标，并主张建立以热烈恋情为基础的新关系模式，企图在被视为个人实验的情欲活动中创造社会运动集体努力的目标（Bullough 101）。勾幔并且首度为当时还被视为非法的各种节育避孕措施提供「女权」的理论解释，认为节育是女性身体自主的具体运动路线之一，女人（特别是劳动阶级的女人）应透过节育来拒绝强制式的母性母职，这不但可以为女人创造自我生命的实现空间（注 16），更可以因女人集体的抗拒而形成对资本家的压力（注 17）（Grant 40; D'Emilio & Freedman 232; Segal 82）。就个别的女人而言，这个非常基进的左派运动路线为女人的情欲处境提供了一个新的复杂立场，因为在节育不普及的年代，怀孕的高机率可以被女人用来当理由挡掉不想进行的性事，但是它同时也为想要开

展人生的女人创造无比的焦虑和可能不想要的后果；而左派运动在此时把节育重新定义为女性自主，一方面拿走了女人推阻性事的方便理由（怕怀孕），迫使女人不再用这种说法继续强化性和怀孕之间看似自然必然的连结，且转而在拥抱情欲及抵抗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寻求新的抗拒论述；另一方面，节育也降低了女人参与情欲活动的代价，享受情欲不再必然有生养的重担，女人仍可以投身创造其他的人生出路。

以世纪之交的历史眼界，这个抗拒母职、身体自主的说法是非常进步的。可是后来最积极推动节育运动的人，像玛格丽特·桑儿（Margaret Sanger）以及大西洋彼岸的玛俐·史透普斯（Marie Stopes），都在各自的交游圈中受到当时中产阶级背景的优生运动（eugenics）所影响，她们冒着牢狱之灾，热诚的推动节育的理念和实践，基本信念则在于减少下层贫穷或「低等种族」的人口，以便让社会更进步（Asbell 9; Grant 43; D'Emnilio & Freedman 245），同时为了避免背负鼓吹性开放的恶名，她们也坚决反对教导未婚女性避孕（Grant 41）。结果，在不动摇种族、阶级、婚姻地位的立场上，优生的信念逐步赢得了医学人士的支持。透过医学论述建立的正当性，节育运动得以在大西洋两岸开展，主要的对象则是下层阶级的已婚女性。这些努力虽然促使节育得到正当化的地位，间接缓和了一般民众对性的顾虑与负面印象，但是节育的基进解放内涵也在这个过程中被优生考量所取代（注 18）。

当剧烈的社会变迁引发舆论强烈关切社会秩序的变动时，有关「性」的论述往往成为道德及社会变迁的一个象征指标，也因而成为各方争战的场域，更成为阶级张力充分展现其操作的替代场域

(Weeks74)。毕竟，情欲上的越轨行为并不只是女人们各自生活上的秘密而已，情欲论述也不只是另类的意见而已；事实上，世纪之交的情欲消费空间、活动以及论述一旦形成高度的可见度，很快就引发社会关切，并因而激化各种道德的和意识形态的辩论，更加提高性革命的分贝。世纪之交，除了前面提过的社会纯净运动和进步社会运动之外，来自美国第一波本土性学先驱者的专业论述也在此刻浮现（注19），其动力和正当性则来自社会纯净运动对性病、青少年、及女性情欲的忧心（Bullough 304-308; Weeks 75）。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的性学研究也是一个新的身体政治学：它以专家的、学术的、医学的论述，来重新定义并经营身体的规范、道德的重整、甚至优生的考量。

即便如此，性学研究从欧洲发源开始就带着另一些相对于当时主流文化脉络而言颇有进步意味的内涵，因而也有助于性论述与性意识的革命。性学研究者对科学抱持的无上信念不但表达为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更呈现为他们对性的自然法则的追寻（Bullough 3-6; Hekma 187; Weeks 62-72），而这种把性当成自然天性的研究态度和语言，有效的挑战了原本由道德谴责来主导的传统性论述，也首度提供机会让诸多性模式浮现。欧洲的性学研究先驱（如 Richard von Krafft-Ebing, Havelock Eill, Magnus Hirschfeld 等人）都竭力以客观的语言来描述性的各种面貌及形态（由性变态到同性恋到童年性欲到女性情欲等等），他们钜细靡遗的记载个案、分析特色、列举性质，终究则是希望在这些看似差异多样的性现象及性表现之下，发现其共有的性欲源头及自然法则，并追溯此源头在发展的过程中因着哪些个

人的、意外的、环境的因素而形成此刻众多差异的面貌。性学研究者于是以性百科全书的模式来记载描述并进行他们对性的分析；取样的完备多样及描述的准确详尽是他们的目标，理性的了解和冷静的研判是他们希望投射的形象。在这方面，性学研究都展现了典型的现代化趋势及色彩，研究者自我期许客观中立，以科学为指标来理解并掌握性的各种变型，在知识的领域中努力发现有关性的「真理」以奠定性学发展的基础。在那个还颇为宗教禁欲、道德保守的社会环境中，性学赖以自诩的理性研究态度可以说是非常前卫的。

性学论述对性实践和性主体的列举描述固然将各种性主体类型化、定型化，促成了后者被抹黑丑化，但是性学论述却也同时生产出可以被转化挪用的语言和思考（Bullough 318; Faderman 91-92; Weeks 76-79）。至少，性学研究的科学语言在某一定程度上正当化了性的社会呈现以及一般人（特别是女人和青少年）对性的高度兴趣，因此间接支撑了情欲生产力的发展，甚至从性学研究的角度显示了当时情欲生产关系规范之不当（注 20）。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舶来的性论述，例如，英国的哈夫洛克·艾利斯（Hacelock Eillis）的著作在英国被禁，因此转而在 1897 到 1910 年间连续在美国出版了六册《性心理学研究》（*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虽然他的理论仍然假设了男女在情欲表现上的本质差异、性爱灵肉之不可分、以及一夫一妻制度的优越性（但除去了排他的贞操观），可是艾利斯同时也对 19 世纪以来的保守情欲传统大加批判，平反了手淫、女性情欲、同性恋等等积极表现情欲的方式，把非婚姻生殖导向的性，从过去那种病态罪恶的说法，转化为无法自抑、「不可避免的发展」（Robinson

13)，具体的试图在以婚姻和生殖角度来思考情欲的传统中投下变数。另一个对美国情欲生产力有重大影响的性学研究者就是 1909 年首度访美的佛洛伊德，他有关幼儿性欲、家庭罗曼史，以及性压抑会导致精神官能症、性本能强大而时时流动等等说法，透过诸多知识份子的普及引介而深入人心，促使性逐渐被视为一个不能不面对、不能太压抑的能量，把性更加自然化、正当化，也把人类的文明（以婚姻、异性恋、保守性道德等为代表）显为外加之恶（D'Emilio & Freedman 223）。世纪之交的这些性学研究论述都对情欲生产力和情欲生产关系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着复杂但是深刻的影响。

年轻劳动人口的流动生活方式、资本主义欲望生产的扩张运作、情欲空间和活动的多样化、基进社会运动的眼界异象、中产阶级的认同及其性操作、性学研究的启蒙理想——这些因素各有其运作的方式和领域。各有其推动的方向和速率，彼此之间甚至有着重重因果渗透关系，但是它们的历史际会在快速增长的情欲生产力和摇摇欲坠的情欲生产关系之间形成复杂张力。这个张力在世纪之交性革命末期的历史沉淀，可以在 1920 年代风行美国的各种婚姻手册中找到迹象。在这些婚姻手册中，虽然贞洁仍然是个不言而喻的镇山石，而性基本上还是被要求在婚姻之内进行，但是从《婚姻之爱》到《理想婚姻》（注 21），当时走红的婚姻手册的书名就描绘出婚姻性质的转变：情感和性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性爱的满足被视为是夫妻二人都需要努力的目标（D'Emilio & Freedman 265; Seidman, *Romantic* 77-81）。而当婚姻的品质（特别是性爱的品质）被凸显，被视为夫妻双方的责任时，这也暗示婚姻的问题是可以由个人的努力来解决

的——只要有「专家的指导，如：正确的性知识，适当的技巧，和正确的态度」(Seidman, *Romantic* 76)。这种对婚姻和性爱关系的改良式看法，显示情欲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迁，因此一夫一妻婚姻体制也必须为此前澎湃的性革命提出一个折衷的调和，把性更深刻的嵌入婚姻关系，以间接对蓬勃的情欲生产力加以包裹控制（注 22）。同时，这个关注也种下后来美国社会对「正确性知识」的渴求，强化了性学论述和专家在情欲领域中的知识权力运作。

III

经历世纪之交的性革命之后，1930、40 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或许带来了生活的困苦和不安，挑战了情欲活动的动力和物质基础（注 23），因而挫折了情欲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个物质缺乏、生存不易的时刻却也使得切断性与生育之间的连结成为愈来愈迫切的需求，并加速各种节育措施由中产阶级向下层的扩张（D'Emilio & Freedman 247）。相较于情欲文化其他方面在这段期间的紧缩，避孕研究以及原来已卓有成果的性学论述这两方面的耕耘反而在此需求中有了长足的进展，也为 1960 年代蓬勃上路的性革命准备了具有正当性的论述和实践，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避孕研究方面，医学发展史上一向充斥着因为惧怕「不道德」的标签而放弃或避免的性研究（Bullough 135）。1930 年代内分泌医学首度成功的分离出男性和女性荷尔蒙之时，原本也只是想对（男性的）生殖功能和循环有更深入的认识（注 24）。希冀透过操作荷尔蒙的分泌来创造或终止衰老的过程（Bullough 125-126），至于要进

一步获得正当性来进行所谓「干预自然」的节育研究，这还需要另外一些强大的理由。好在，1920年代性革命之后新婚姻手册的风行，不但反映了性爱在婚姻中的意义和地位已有了重大的转变，同时也具体呈现了许多人不便明说的担忧——那就是，传统的婚姻日渐衰颓，而其最主要的原因被认为是夫妻因担忧怀孕而在性爱生活上踌躇不前（Bullough 137）。一旦大家愿意相信性爱是婚姻关系中需要不带后顾之忧进行的热情活动，那么和性爱相关的资讯及商品就成为迫切需要普及的基本装备了。这个和改善婚姻关系相连的考量使得从1930年代开始，不但许多药厂对相关避孕的研究大有兴趣，连医学界也因为避孕和婚姻幸福连结得到了正当性因而投入研究。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从19世纪起就以淫秽为理由阻碍节育研究讨论及资讯流通的Comstock法案终于在1936年废除，积极推广节育避孕的「计画生育」组织（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于1942年成立，正式标记了节育从进步运动的女性身体自主理念，转为巩固家庭结构、提升家庭品质的政策性措施（D'Emilio & Freedman 248），但是也在此中留下了改变性意识的种子和建制，为1970年代堕胎合法化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发展据点（D'Emilio & Freedman 335），这是后话。

值得提醒的是，1930、40年代不管是婚姻性爱或避孕节育，甚至婚外婚前的各种性实践，都已经是在世纪之交性革命所沈淀的性意识中被理解、被认知、被欲望；换句话说，前一段时期情欲生产力在性活动、性论述、性道德方面的热烈发展或许在此刻速度减缓沈潜，但是它们已经留下了新的情欲地平线，新的思考和经验起点，甚至构筑了新的情欲运作基础。毕竟，艾利斯和佛洛伊德性理论的通俗引

介，透过对婚姻性质的新要求，已经深深的种下了性的正面意义与必要性，求偶消费文化的积极变迁则逐步正当化了许多新的性活动，这些都重新刻划了性的文化想像与呈现，将在下个阶段重大的人口迁徙集结中带动新的情欲生产力。

以1940年代一个重要的例子为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涉入，深刻的影响了原本以异性恋婚姻为主的情欲发展。大批年轻美国男人离开原有的异性恋人生轨道，进入男性集结的军中，后方的女人则首度有机会穿上传统认为非女性的服装——长裤（Faderman 125），离开她们受限于异性恋婚姻家庭的小世界，大量进入几乎全女性的国防工厂和军事单位工作，同性情谊于是在这两个纯粹性别的有利场域中苏醒茁壮，并在战后解散军队时继续在诸大城市集结发展成为同性恋的新社群（Faderman 120-130）。但是，这一波的同性集结和世纪之交的同性情谊发展有一个根本的差异：世纪初性学论述对性的凸显以及对同性恋的友善描绘，加上1920、30年代围绕着像《寂寞之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之类通俗同性恋小说的猥亵官司和知名度，使得1940甚至1950年代对同性情谊的期望、想像和实践都带着身体和性的全部欲望和动力；前一个世代逐步发展的性意识、性实践和性态度，也在此时达到了新的成熟高度和多样性，这些历史条件的汇集遂促使当时的情欲生产力开出灿烂的同性恋花朵来。

另一方面，如果说世纪之交的性学研究使得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正当性，被视为人生重要的动力，那么1940、50年代的性学研究在战后的新性别氛围中就更进一步展现了性欲的多样呈现，自然化了性的诸多表现及满足形式。特别是印地安邦大学的金赛（Alfred Kinsey）接

连出版有关男性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 1984) 和女性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 1953) 性行为的研究报告, 将性充分带进大众的眼帘。这些研究的庞大数据、广泛取样、及绵密的访谈, 有力的聚焦于美国人的性习惯和性价值观, 具体的显示有一个极其广大多样而隐密的情欲世界存在于普通人的生活中, 和一般道德规范所教导的单一贫瘠模式截然不同, 而所有的性实践和性口味, 不管多么边缘, 在金赛的分类系统中都不过是性光谱上具有些许程度差异的表现方式而已 (Bullough 172-177; D'Emilio & Freedman 268-270; Robinson 66-81)。金赛的性研究所投射的科学形象和数据的说服力, 成功的扣紧了当时实证科学在通俗媒体中日渐升高的可信度, 不但吸引一般媒体广泛引用, 也提供了大量范例素材给寻求耸动题目的通俗作家及专栏作家自行转化运用, 因而更加普及金赛研究的结论, 形成主导美国性讨论的权威论述。

金赛性学报告对美国情欲生产力的发展显然有着深刻的影响。毕竟, 当性理想与性现实之间的差距和差异铺陈眼前时, 群众过去对私己独特性事上的焦虑得到了纾解; 当众人各自的性差异观点和性实践以具体数据和细致描绘方式呈现时, 原本单薄的情欲资源世界突然有了丰盛的想像和学习空间; 而当性学研究成功的结合了实证研究努力建立的强大说服力时, 性的公共讨论和呈现也同时赢得了正当性。更可贵的是, 金赛的性多元理念是在冷战的 1950 年代麦卡锡白色恐怖对性异议份子的沉重打压之下浮现 (注 25); 尽管带着有限的历史眼界, 金赛对性差异的包容尊重态度在当时保守的政治气氛中却仍然奋力创造了新的友善环境。例如, 当性习惯和性价值观被性学研究显为

多样而差异时，当性被认为不再仅仅是异性恋插入式性交时，一向控制性的文化呈现的司法官，再也不能以单一的尺度来衡量性的公开消费。因此，由 1957 到 1967 年间，以华伦大法官为首的美国司法系统对色情表达出极大的宽容态度 (D'Emilio & Freedman 287)，使得情欲言论自由得到司法制度的包容，性的商品迅速嗅出开发市场广泛需求的机会 (Ehrenreich et. al. 105)，一向被打压在地下流传的色情书籍、杂志、图片及其他商品终于得以搬上抬面，为情欲生产力的多样发展提供最具象的呈现。

毕竟，性学论述或许在学术和理性的层次上提供了思考框架，但是对于普通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实践而言，还是要靠通俗出版品以持续的、多采多姿的方式把性自然化于日常生活的消费和活动中。在这方面，出版业在 1939 年推动的「平装书革命」首度使书籍得以廉价方便的在处处皆有的杂货店、报摊、及其他零售据点贩售，1940 年代的出版商于是顺势推出各种耸动的小本情欲小说、扑克牌、照片、甚至色情内容的唱片 (D'Emilio & Freedman 280)，这些小本经营的性文化事业为当时不太丰富的情欲资源提供了最平民化的消费。随着美国经济的快速蓬勃发展，1953 年海夫纳 (Hugh Hefner) 创立中产品味的《花花公子》月刊 (Playboy)，接着推动各种和情欲相关的休闲企业，不但以最绚烂的方式展示女体，更同时推动男性观点的性自由哲学，鼓吹自我沈醉和奢华的生活方式，带动了整个一代男性的自我幻想形象 (D'Emilio & Freedman 302-303)。不过，也有些学者认为，《花花公子》的出现并非如某些教条女性主义者所言，仅仅是父权恣意展露自身的丑陋面目，而其实主要是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已

逐渐进入消费导向的经济，需要把占人口一半的男性营造成为新的消费主体而非汲汲工作的生产主体而已，因此鼓励男性背叛传统中以养家为人生成就的男性形象，多在消费活动中实现自我。在这个理解框架内，女性身体的暴露呈现，与其说是提供给男性发泄享用，倒不如说是具有另一种进步意义，可以用来松动拆解「男养家」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更重要的则是保障男性认同与异性恋的不可分（注 26）（Ehrenreich 51）。这个解读在性别的轴线之上又加了经济模式和异性恋两条轴线的考量，对情欲现象提出了较为丰富的理解。不管如何，《花花公子》深刻改变了女体的呈现，改变了情欲的形象，它以最有中产品味的口味形式来包装呈现过去在道德规范下被当成最低俗的情欲和身体活动，具体呈现了——也正当化了——新的、性的市场品味。

也正是因为像《花花公子》之类的男性色情产品以明显的男性本位观点自然化了性的开放，因此许多女性主义者在评估这段历史时常常认为性革命其实只是男性的「性市场革命」而已（如 Jeffrey 91-94）。不过，这个简单的评估有点问题，另外一些女性主义者就指出，性自由并不是什么崭新出现在男性生活里的东西，一般而言，男性一向就享受比较大的情欲空间：「事实上，如果有哪个性别曾经经历性态度和性行为的大转变，值得被称为革命的，那应该是女性，根本不是男性」（Ehrenreich et. al. 2）。

IV

世纪之交的性革命已经为女性情欲主体创造了个别实践和探索的

具体空间，1930 到 50 年代一连串论述、研究、以及通俗文化在性领域之内的累积则为性的享受创造了正当性；时至 1960 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解放运动将被压抑的、禁忌的话题更广泛的带进文化领域，年轻一代借着不受羁束的身体性爱做为抗拒成人建制的政治表态方式（Grant 13），资本主义的情欲生产则在文化论述方面达到另一个高度，这股强大挑战既有性道德的动力使得新的情欲主体的生产进入集体的、全面的发展，形成第二波的性革命。带头冲刺的，仍然是女性。

首先，景气的 1960 年代资本主义在文化消费层面上的积极生产，使得跃跃欲试的女性得以在商品和新的生活方式中具体塑造女性情欲主体的身分与实践。最明确的征兆就是，1950 年代的女性杂志主要还是一般的家庭主妇杂志，充满日常生活中的家事心得和经验，但是短短十年后，性变成了女性杂志的主要卖点。例如，原本是家庭杂志的《柯梦波丹》（*Cosmopolitan*）于 1963 年由以畅销书《性与单身女郎》（*Sex and the Single Girl*, 1962）著称的作者 Helen Gurley Brown 接手编辑（注 27），初期以职业妇女的生涯指南为主，但是很快就认识到读者群的性质已经在历史的过程中转变，新一代的年轻妇女经济上比较独立，自主的动机强，教育水准也已提高（注 28），《柯梦波丹》于是闻风转向，顺势把当时英国已经很发达的「浪荡单身女人」（the swinging London dolly-bird）概念，建构为新的美国版「柯梦女郎」（the Cosmo Girl），在杂志内容方面则主要是为单身女郎提供情欲和身体消费上的指南，并且明确的以图像和文字来表达女人拥有新的性自由。杂志推出之后大受欢迎，有些历史家甚至认为，《柯梦波丹》最大的贡献就是使得女人的性显为自然而可敬（Grant 98-123），

这在普遍相信「性属于男人」的美国文化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发展，也带动了后来其他如 *Ladies' Home Journal* 以及 *Redbook* 等传统通俗女性杂志在竞争的压力下对性生活话题的开垦。

除了通俗杂志的女「性」化之外，充分反映 1960 年代女性观点的性学论述也在此时深刻的影响了一整代女人对身体、对性的观点与实践。其中最有名的研究论述要算是马斯特与琼生 (William Masters & Virginia Johnson) 的 *Human Sexual Response* (1966) 以及 *Human Sexual Inadequacy* (1970)。这些研究虽如其批评者所言，受限于中产智识阶级受访者的性经验和偏好口味，只反映了那个阶层的成年受访者在性事上的特有表现，把高潮当成性愉悦的唯一尺度，甚至在统计时刻意排除了所谓偏差的情欲模式 (Robinson 134-140)；但是马斯特与琼生的研究首度正面肯定了人类可以主动透过自慰来达成情欲上的自给自足，他们对性高潮模式的分析还显示，女性在性上面的能力与需求和男性无分轩轻，甚至远超男性。更令人惊讶的是，女人甚至不需要男人，因为她们透过阴核可以自行达到的性欢愉比异性恋性交更为强烈。性不再仅仅是主动男性宰制被动女性的场域，而有可能是「对女人的力量和独立的肯定」(Ehrenreich et. al. 69)。

身体是力量和愉悦的来源，这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也是全新的女性情欲实践。马斯特与琼生具有实证基础的研究结论帮助了女人肯定她们的性欲需求和探索，也使得女人对性采取比较正面的态度，这对情欲生产力的阔步前进有极为重要的贡献。不过，当马斯特与琼生在肯定女人的性的同时，不但热情的把婚姻视为性的主要场域，也强调女人在性上面的「困扰」应该寻求「专业」的帮助（如性治疗门诊）

而不要在彼此的倾诉叙述中「加重病情」；这么一来，性的理解和诠释最终还是被保留在医学专业权威的手中（Irvine 142）。好在 1960 年代各种社会运动的集体自我成长风气使得女人有机会在「意识觉醒」（consciousness-raising）的小组活动中操练自我描述的论述生产，更在交心的叙述中沉淀捕捉自身的经验感受（注 29），故而到 1976 年海蒂（Shere Hite）开始出版她的性学报告时，女人已经累积了足够的语言和观察，可以用最肯定的语调和最具体的说明，来对既有的情欲生产关系在她们生活中所造成的严重枯竭提出最沈重的抗议。

另一个对新的女性情欲主体有利的发展是，在 1960 年代性革命之前，所有的性论述几乎都掌握在医学专家手中，即使是多所鼓励开放的婚姻手册也是由医学专家撰写；但是从这个历史时刻开始，有愈来愈多的通俗论述出现，突破性医学的论述垄断，而且是以教战手册的方式教导女性读者如何主动进行性事以达到最满意的性生活（Ehrenreich et. al 81）。其中最着名的例子就是 Terry Garrity（笔名是 J）1969 年出版的《性感的女人》（*The Sensuous Woman*），作者以自助手册的方式实际教导女人如何做充满情欲、不畏身体享受的女人、如何做好性伴侣、如何展现性魅力、甚至如何口交等等。另外，波士顿女性主义成长团体集体撰写的医药保健及性手册 *Our Bodies, Our Selves*（1971）也首度开创由女人经验出发的身体论述，极力推广女人的自主选择 and 性爱自由，甚至远超异性恋和婚姻规范（Seidman, *Embattled* 46; Snitow et. al. 27）。这些自发的论述都以开朗肯定的语言来谈女人和性之间的正面关系，并明确的、按部就班的教导女人如何发现身体，如何自我营造快感，如何累积女性情欲的文化经验，因

而大大的提升了女人涉足情欲的正当性。同时，这类建基于主体经验的性论述也将性呈现为无数可供个人选择挪用的具体活动形式，其中包括像从 1970 年代开始流行的口交 (Ehrenreich et. al. 82-87; Grant 120-123)，因而使得各种过去并不普及的性活动在交流学习中逐步扩散 (注 30)。更重要的是，当性不再是什么神奇神秘的身心交融，而被视为是需要经验和练习的「协商」过程时，女人也被赋予更大的空间来掌控这个活动 (Ehrenreich et. al. 90)，因而有机会积极塑造情欲生产力的发展。

在这个节骨眼上继续创造女性读者以支撑这些情欲读物的当然是美国的生产体制。由于经济形态变迁，此刻的女性人力需求已由蓝领劳工转向粉领的秘书文员 (Ehrenreich et.al. 54)，因就业机会增加而出现的单身粉领阶级拥有更独立的经济力量和消费形态，因而回过头来也为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提供了发展创意的动力。于是 1960 年代大量出现的单身酒吧、休闲设施、交友中心、各种消费阅读杂志等等商业发展，不但为新的单身生活方式提供休闲和社交的硬体软体，也在这些消费活动中逐步塑造新的单身身分认同，为女人提供在婚姻之外另一可敬的人生选择 (Ehrenreich et. al. 60)。而且，为了更加巩固这种生活方式的运作，建筑业在此时为年轻单身人口的需要设计出专属的公寓社区，好让她们独立生活甚至开派对，而无虞影响父母、邻居或其他老一倍的人口 (D'Emilio & Freedman 304)，这种独立于父母的居住环境当然也有利于自主性高的亲密关系，单单在 1960 到 70 年之间，不婚同居的人口就增加十倍 (Seidmlan, *Embattled* 39)。这种性生活的安排方式并不是此时才有，但是它们过去

在通俗论述中往往被呈现为少数的、可耻的、会有不好下场的；然而此刻在大众媒体中却被呈现为新潮的、洒脱的、令人欣羡的，连硬体空间的安排设计也更方便这种身体关系的运作。也因为如此，新的、与情欲相关的、以消费为主的单身文化很快就扩散到广大的中产阶级，成为 1960 年代以后流行的生活方式。

在这里需要一提的是，活跃自在的性生活当然假设了可靠方便的避孕措施存在，1960 年开始量产贩卖的口服避孕药早已带着应许降临（注 31）。不过，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都很谨慎的强调，口服避孕药并不像它的批评者所忧心的那样有力量「创造」性革命；事实上，它只不过合理化（或者说「方便化」）了已经在蓬勃进行中的性革命而已（Ehrenreich et.al. 41）。况且，即使酝酿于优生运动者的理念，成形于充满种族及阶级考量的人体实验，并且还带着各种当时尚未发现的副作用，口服避孕药却具体标志了女性对自我身体情欲和人生选择的轻松掌握，彻底的重绘了性别、经济上的角色分野。当然，身体情欲上的自主自由并不表示女人就万事如意，但是，就像后来 1993 年「家庭计画组织」的执行长谈到口服避孕药时所言：「拥有选择的权力不等于快乐幸福，但是它至少逼迫女人成长；拥有选择的权力也不表示人生就一帆风顺了，但是它至少使得女人有力量去计画她的人生。」（Grant 56）。

事实上，性革命昂扬的气势也并不依赖口服避孕药，因为，即使 1960 年代末期揭露了避孕药丸可能的副作用之后，女性也并未因此挫折而放弃性革命；相反的，在西蒙波娃的情欲自主论引导之下，她们转而以堕胎合法化为主要运动目标，更积极的努力突破情欲生产关系

的局限 (Ehrenreich et. al 62; Snitow et. al. 18)，因此才促成了美国最高法院在 1973 年作成历史性的判决，使堕胎合法化，为女人提供另一个自由操控身体的机会。

1960 年代情欲生产力最爆炸性的开发，显然并不仅仅在于开拓各种性观念与性实践，也不止于开发新的女性情欲主体；事实上，性革命最令父母师长卫道人士忧心的，是它也把情欲动力赋予了另一个从未在公共论述中与情欲沾上边的人口群——战后富裕年代中首度有经济能力享受休闲的青少年 (D'Emilio & Freedman 353)。

各种情欲消费与休闲设施原本就不排斥青少年新获得的的经济消费能力，当时女性主义在思考身体情欲自主权时也非常远见的把青少年的堕胎权包含在内 (Thompson 296)，这些历史条件的际会部或多或少自然化了青少年的情欲发展。另外，在这个年龄层中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情欲中介，那就是此时开始热烈普及的摇滚乐，它提供了情欲流动的具体节奏和震耳欲聋的节奏音乐，彻底悬置了成人文化对身体的形塑，动摇了主体已经内化的清晰自我控制，使个体暂时放纵于充满狂野含意的节奏中。此刻配搭的舞蹈也不再是中产白种成人圆滑优雅的摆动，而是从贫民区黑人舞蹈中学来的抽搐震荡式的抖动，不但抖腿、抖臀、连头部都在激烈的甩动中制造晕眩的感觉，快速的节奏和巨大的音响帮助青少年用纯粹的身体来体验并刻划世界 (Fiske 50-51)。这种摆脱文化对身体心灵之铭刻的尝试，也在当时流行的迷幻药或大麻吸食中得到具体的出路。摇滚乐、迷幻药、和自在的性活动相连，形成年轻人口群全面拒斥既有社会文化的标志。

同时，伴随着摇滚乐诞生的巨星偶像也为新的性别形象和性对象

开创范例。相对于二次大战后美国男性的平头短发阳刚趋势，摇滚乐的长发和紧身裤传达了中性（双性）时代的来临（Ehrenreich et. al. 32），也严重的挑战了传统的去性（de-sexed）青少年形象。另外，与经济成长齐头并进普反的电视媒体更将摇滚乐的具象（摇摆的身体、新潮的穿着、扭曲的身体、情欲的暗示等等）以最明确的方式普及呈现在新一代的青少年眼前，便于他们模仿学习并正当化自己的作为。更引人注目的是，一向被视为柔弱无欲的青少年们在此刻首度形成的偶像文化中成群的尖叫、昏倒、推挤、追跑，以最具体放纵失控的形式来表现她们的情欲感受。历史学者认为这是女性性革命「最戏剧性的起义」（Ehrenreich et. al. 11）。很明显的，这种彻底的放弃自持是对性压抑的一种强烈抗拒，也使得新一代的女性主体及早开始探索宽广的心理情绪幅度和自在情欲的表达。

新情欲主体的大量浮现显示性革命的能量生产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性别的、代间的、道德的、身体的、生活方式的）既有文化规范的激烈挑战创造了 1960 年代特有的动荡印象，也把当时情欲生产力和情欲生产关系之间紧张的关系用最戏剧性的方式呈现在日渐普及具象的影视媒体中，更加强化了性革命的迹象。

V

1960年代情欲解放的倾向显然是在大氛围中得到商品文化的全力推波助澜，然而它最主要的成就却是在社会运动的反对文化中找到了突破情欲生产关系以及性别体制的力量，并在这个过程中凸显塑造情欲的其他社会轴线。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社会中各种冲突矛盾的

力量和权力轴线总是积极的在情欲战场上角力的。

事实上，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女性自主理念就是从 1960 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和左派社会运动中得到了它最深刻的体认和反省。那些激进社会运动中本来就有大批女性成员在运动过程中累积组织经验，性革命的风潮松动了激进运动的情欲表达，但是也明确的凸显了性爱关系在种族和性别轴线上的不平等（Echols 29-32）。1960 年代中期以后，黑人民权运动的目标在改革牛步慢进和领袖人物（如 Martin Luther King, Jr. 及 Malcolm X）连连遭到暗杀的阴影中，由起初的「族群同化」激化为「黑权」，拥有众多白人成员的左派运动则相应的在这种种族关系激化的情况中把主要的注意力从民权移至反战和反征兵上以避免尴尬。在以男性议题为主的运动趋势之下，（白种）女性成员在运动中的位置更为边缘，但是男性成员对她们身体的要求则并未稍减（Echols 37-38）。1967 年激进女性成员在进步运动的年会中正式提出了性别不平等的控诉，凸显了「妇女问题」（The Woman Question）的浮现，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1968 年，妇女解放升高为女性成员的首要关怀，各个草根的妇解组织在各大城市成立，不但积极找寻自己的理论出路，也在实践中发展出一系列特有的说法和理念（注 32）。这个分裂的举动显示，除了在性别歧视方面的体认外，女性成员也在最素朴的身体经验中意识到，蓬勃开展的情欲生产力极可能有其性别的内涵假设，女性需要突破这种性别盲点，挑战既有的性别关系，开拓新的思考空间，才能将性革命改造成女「性」的革命。女人和性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形成妇女解放运动下一阶段的新争议焦点。

除了情欲的性别轴线之外，激进社会运动在 1960 年代所创造出来的开放空间中也为性偏好这条轴线提供了浮出的机会，并为边缘情欲人口的壮大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支撑。早期成立的同性恋联谊组织逐渐发现自己的温吞气质愈来愈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新一代的年轻同性恋教育程度比较高，政治意识比较强（Faderman 197），她们由其他的运动团体中学会了更加活跃的主动出击策略和经验，更透过其他弱势群体的抗争语言来理解自己和少数民族一样受到主流社会压迫，因而发展出带着强大正当性的强悍气势；她们追求的不再是仅仅被接受被包容，而更是彻底的平权和完整的人权。事实上，著名的 1969 年石墙暴动事件之所以能快速凝聚同性恋群众，形成 1970 年代同性恋解放运动全面出发的契机，正是因为它已经从那个时代各种进步运动所累积的动员策略相抗争经验中得到了不可或缺的滋养（Faderman 193-196）。在另一方面，嬉皮运动中对于传统性爱、衣着、道德、生活方式等的挑战，则为同性恋的自我呈现提供了灵感和掩护，使得整个一代的同性恋得以在比较丰富自由的文化资源中开发自我的形象（Faderman 203）。这种揉合了抗争和自我壮大的运动经验深刻塑造了后来像「女同志国度」（Lesbian Nation）和「酷儿运动」（Queer Movement）之类的运动形式（注 33），也在开发新的情欲论述和思考上打开了视野。1960、70 年代的解放运动甚至提供了自主抗争的气势以及人权至上的论述武器来滋养被污名化的性边缘人口的解放运动，1970 年代中期美国的娼妓便开始推动伸张妓权的组织，以最肯定自我的强悍姿态挑战性主流霸权（参看 Jenness）。

情欲生产力在 60 年代的长足进展，随着进步社会运动对整个社会

结构的挑战而不断的冲撞既有的情欲生产关系。但是性别、种族、性偏好、阶级等因素却也在情欲生产力的发展中显现为各种相关议题上的矛盾冲突立场，而当这些立场的对峙遭遇到比较紧缩的历史条件时，就难免形成对情欲生产力的严厉质疑。毕竟，女性主义者退出男性主导的进步运动自成组织时，并没有就此解决性别、性偏好、阶级、生活经验等轴线上的差异。

1970 年激进女同性恋团体 **Radicalesbians** 在女性主义的基础上提出「女人认同女人」(woman-identified-woman) 的理念，觉得女人应以女人的利益和连结为首要目标，因此女性主义者不能再与敌人（男人）共枕，而应该只实践「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 的性，「大女同志主义」(lesbian chauvinism) 于是成功的以最纯粹的立场和最强势的语言成为女性主义的新火车头 (Faderman 212; Snitow et. al. 20)。在这个新的性别逻辑之下，对性别歧视的痛恨在「意识觉醒」的成长活动中形成义愤，个别女性成员由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叙述父权的阴影和伤害，借以鼓舞反抗的气势，巩固女性的主体性。可是，在既有的主流情欲文化资源中，女性主体的发言位置多半是受害者，情欲文化中所提供的是丰富的受害语言和意象，再加上「与敌人共枕」的可能批判，这使得意识觉醒团体中的经验分享经常只能用一种而且只能是受害者的叙事情节和情绪出现 (Snitow et. al. 20)。因此这些活动中对性侵害的一连串揭发和自觉，不但揭发了父权社会的丑陋面貌，也同时凸显了既有情欲文化在女性的情欲语言和愉悦经验上的贫瘠 (Grant 207-208; Tieffer 115-146)。

女性成长团体中逐渐浮现的愤怒和无力感透过「夺回黑夜」

(*Take Back the Night*) 之类的街头抗争运动而扩散，也部份的扣连了当时美国大环境中另一些际会的变化情势（注 34）。经济衰退的 1970 年代创造了美国人不安的心境：政治上，越南战争的失利和柬埔寨的失守动摇了美国一贯的世界强国地位；经济上，石油危机则暴露了美国富裕生活之下的薄弱基础（Seidman, *Embattled* 62-72）。在这种焦虑的环境中，新右派（New Right）等保守团体于 1974 年开始浮上台面，成功的动员媒体在论述中把这些不利的局势归罪于性解放以及其他进步运动带来的家庭解体和相应的国力衰颓（注 35）（Seidman, *Embattled* 82-89），「拥护家庭连线组织」（Pro-Family Coalition）随即在 1970 年代末期开始推动「家庭」的单一传统定义（Trudell 17），各种在此刻应运而生的民意调查于是顺着人心的踌躇和不安，重新刻划单身女性的孤寂空虚和性的危险，把怀旧的家庭意识形态发挥到最高点（Ehrenreich et. al. 171-179）。逐步成形的自我怀疑、退缩心态遂表现为对一切异己和变化都深具戒心，在这种氛围内，性革命所带来的进步空间首当其冲，1973 年才通过的堕胎合法化法案在四年后就遭到国会通过进一步修法，裁撤医疗制度对堕胎的经费支援，也撤去了好不容易才夺来女性身体自主权的经济基础，腐蚀了妇女运动奋斗多年的成果（Snitow et. al. 28）。更沈重的打击是 1978 年前后，原本已经通过的「性别平权宪法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证实无法获得 38 州的认定支持，因而无法成为正式的宪法修正案，更加深了妇女运动的挫折感（注 36）。这种挫折无助的感觉在媒体和保守团体强大的论述攻势中很容易的就被征召到回归传统的阵营中，于是女性成长团体中沈痛控诉父权的能量不但没有被

引导去批判连保守派都已经看到的问题焦点——家庭结构及其养成的性别权力及性角色分工，反而被聚焦于情欲生产力中最令保守派非议的面向——色情。

1970年代初期，色情电影工业在开明的社会风气中蓬勃发展，逐渐脱离短片的形式而模仿主流电影的情节和制作，成为大量发行、普遍可见的成人级剧情长片（Williams 120）。它们在影像上的钜细靡遗和在文化中的高度普及使得色情轻易的成为争议的中心，不但引发保守份子的攻击，其所谓男性观点也引发某些女性主义者的强烈关注。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认为，虽然经过了1960年代的努力，女人的地位和权力一点都没有改善，仍然是全面遭受剥削压迫，在色情材料中就能清楚看到（注37），因此，要改变女人的处境，就要全面禁除色情。这种关切和保守人士出于道德或宗教理由的批判合流起来，反色情的运动因而在1980年代快速壮大，并给予保守份子机会转化使用女性主义色情批判的语言来呼吁全面禁止色情（Vance, "Negotiating" 37-38）。可是事实上，面对女性消费能力和情欲角色的变化，1970年代中叶已出现男性脱衣舞的场所，色情影片也已经开始调整脚步以诉求愈来愈活络的女性情欲主体（Ehrenreich et. al. 111-117）；即使许多色情影片仍然缠绕在虐与被虐的主题上，成人色情长片已经很明确的开始描绘以女性性主体为中心的剧情发展，而不再把女人只当成被用来满足男性欲望的性客体（Williams 176）。然而，对反色情的女性主义者而言，这些都只不过是父权更进一步收编女人、控制女人情欲的作为。换句话说，情欲生产力的任何发展都只不过是男性霸权的进一步扩张而已——因为情欲本身就是「男性权力的社会建构」（a social

construct of male power) (MacKinnon 128)。

同时，妇女运动之内也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而出现反挫的现象（注 38）。1960 年代以来的性革命所带来的重大转变在短短一、二十年间还没有能够沉淀吸收，就遭遇美国经济社会环境的恶化以及新右派无情的抹黑打击；性革命在个人生命和理论及实践方面也都还有许多极待细致处理的问题。比方说，大多数女人在长久调教的情绪和无意识中仍相信女人的力量有限而男人的暴力与权力无限，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和价值判断也继续认定家庭结构仍然是不可怀疑的社会关系，1981 年通过的「家庭保护法」(Family Protection Act) 更以控制政府经费补助来压制不同于传统的学校性别教育或同性恋家庭组合 (D'Emilio & Freedman 349)，以致于在性别关系上越出常轨的个人（特别是女人）常常面对极大的困苦孤立，要不就只好选择回归家庭 (Willis, *No More* 125-127)。面对整体环境的紧缩和女性个人生活中的困难抉择，从 1980 年代开始，在女性主义阵营中就有反挫的迹象，不少着名的女性主义者公开抛弃原来对一夫一妻家庭体制及其不平等权力结构的彻底批判，重新拥抱（此刻被媒体大量凸显而美化的）家庭和它一向所代表的温暖（注 39），认为家庭的某种有机完整性是深植在个人心中而无法动摇的；她们也放弃早先自由开放的性主张，转而认为女性主义不应该用太激进的理念得罪太多男人或女人，而应该拾回原来的传统性别分野和母性角色，并且认为比较有效的社会变革方式是用女人的特有温婉风格和气质去改变公领域中的真实政治 (Stacey 210-221)。

妇女运动之内对性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 要求、

甚或从改变「性的部署」的努力中退却，以及妇女运动对外的强烈反色情立场，都一再缩小妇女解放的运动和论述空间，使得另一些女性主义者和女同性恋深深觉得进步运动不能放弃情欲生产力所可能带来的自由和自主，也不能放弃对一夫一妻异性恋婚姻体制的批判——特别是在雷根政权上台所代表的保守氛围内。于是 1982 年在 **Barnard College** 举办的 **Toward a Politics of Sexuality** 学术会议点燃了女性主义的性辩论，凝聚了女性主义性激进派（**sex radicals**）多样多元的性观点（注 40），继续向女性所受到的传统情欲社会调教（**erotic socialization**）挑战。从 S/M 的性角色扮演、到女同性恋色情材料、到性对象的多元发展、到禁忌的性爱活动，性激进派的现身及论述生产使得这些边缘的情欲形式得以出线扩散，也为新的性主体创造集结和组织的动力（**Seidman, Embattled** 146）。

映着 1980 年代背景中逐渐加大的爱滋病阴影以及它对边缘和多元性主体的抹黑恐吓，性激进派在谨慎中继续性革命已经开创的情欲空间和选择，在爱滋的现实中重新思考性的实践与意义，更在爱滋所衍生的各种医疗和服务中强悍的对抗其中隐含的性歧视和性压迫（参考 **Patton**）。事实上，1980 年代以来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生产被迫愈来愈唱和保守的道德观，除了媒体中继续刻划性的虚幻和危险之外，在面对青少年的性探索时，国家机器也得到成人的充分授权而将性教育课程广泛的进驻校园，更加普及性的意识；可惜其中主要的语言仍是延迟加恐吓加危险，性革命中逐渐浮出的女性情欲仍然被压抑丑化（**Fine** 32-45）；性虽然已经成为大众常识中的基本思考面向，然而它也时刻遭受强大的监控。在这个时刻，也还只有那些边缘的、另类的情欲

运动主体（例如性基进派、同性恋、双性恋等）在公共论述的场域中继续转化资本主义情欲生产力的冲撞力，继续活络使用性革命的丰富遗产，拒绝让情欲生产关系紧缩空间，拒绝让一夫一妻的异性恋婚姻垄断情欲的合法园地。

198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衰退和新右派所形成的社会紧缩心态互相搭配，或许不太有利于情欲生产力的大幅发展，但是新的边缘情欲主体仍然不停的在抗争中浮现，新的情欲争议也使得性的疆界和部署时时流动扩张，更重要的是，此刻的情欲地平线已经大大不同于往日。回归婚姻和家庭的保守呼声虽然似乎甚嚣尘上，但是人们在进入婚姻之前绝大多数已经有了丰富的性经验和性资讯，性变成了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而且不断进行的活动，性经验使得女人有了更多能力来协商自己身体的主权，家庭的结构和组成实验着各种新的面貌，性别的角色和功能都有了新的定义，婚外情欲活动更是频繁而多样，生殖科技的突飞猛进使得性和生殖功能之间的距离愈来愈远，通讯科技则使得性的资讯和人际连结方式更广泛的流传。从青少年到老年，情欲再也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奢侈（D'Emilion & Freedman 333-338）。

换句话说，1960年代以来持续进行的性革命或许在一般的论述中被划归为过时，被通俗的观点视为错误，更被保守派宣告死亡，然而性革命所创造的新世界却是此刻任何情欲实践和理念的新基点；情欲文化的任何进一步（或退一步）发展也都必须从这个基点和其所创造的权力布局和人生可能上开始协商。「令人深思的是，至少西方世界已经对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性解放风气重新进行了不少评估。但是这个重新评估也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尽管那个年代有其过度

放纵以及不容置疑的性别歧视，但是它所达成的进展是值得保存的」(Altman 105)。

回顾 1960 年代开始的性革命，女性主义者有着矛盾复杂的情绪。不过，就像妙丽·戴门 (Muriel Dimen) 说的：

性当然不是革命的唯一之路，但是它是塑造欲望的主要力量，而我们对欲望的限制往往直接导致了自我否定和社会虚伪。说实在的，我们的问题不是欲望太多而是欲望太少；我们的无力反叛以及未完成的革命，都根植于性压抑对欲望的压迫，而正是这种性压迫截断了一切希望。1960 年代反对文化中那种呼求解放欲望的乌托邦狂想，现在在左派及女性主义者中间都不再流行了；我们好像已经应该长大了，不应该再眼睛大，肚皮小了。可是这种时髦的「成熟」恐怕根本没认清欲望的本质，那就是：不管欲望多么痛苦，不管欲望看起来多愚蠢，多贪心，我们都需要尽力的想望。我们或许得不到想要的一切，但是只有继续想望我们所能想像的，我们才可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 (Dimen 48-49)。

VI

以上的叙述为性革命——甚至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的理论补充了一些思考方向。我认为简单的说劳动民主和经济能力的发展促成了性的发展，因而造成对婚姻体制的冲击，甚至形成性革命；或者太轻蔑的漠视性革命的重要性，或者太快的断言性革命的必然方向或结果——这些都不是什么太有意义的做法。历史显示，资本主义本身的扩张已经具体的带动了情欲作为商品生产和消费的一部份，劳动人口的流动、休闲文化、媒体及广告、性别角色的变迁、消费道德所渗透的情欲享受心态、青少年次文化等等方面的快速发展都已经大幅提升了

情欲生产力，再加上进步社会运动和现代性学的某些论述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各种交战施力，这些风云际会都为情欲生产关系的动荡提供了更多的变数。性行为、性论述、性认同、性商品、性模式的多样化以及它们在再现和论述领域中的明显可见度，这正是性革命昂首前进的征兆，也是性部署（**deployment of sexuality**）动荡变化的时刻。而什么样的介入能够更进一步壮大情欲生产力，激化它与当下情欲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或者换个方式说，就是彻底改变情欲的生产关系，驾驭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情欲生产力扩张，使得情欲生产关系更加多元、开放、流动——这恐怕是所有进步的劳动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由历史的先例来看，性革命带来的当然并不见得一定是情欲生产力的全面解放，性革命也不一定保障情欲受压迫者的全面翻身，情欲体制总是以各种方式继续吸收改变的动力；但是，只要有进步运动的介入，有抗争，就至少「改变了辩论的条件」（Willis, "Foreword" viii），也就是改变了压迫和斗争的条件及局势。美国百年来的两次性革命都因着各种进步运动的积极挪用和转化，为多元情欲主体创造了此刻以及下一阶段抗争的资源动力。换句话说，这些介入和抗争不但使得女人、青少年、同性恋及其他性多元人士等等情欲受到压迫的主体，有机会在动荡的社会条件和结构中寻求抗争的机会和可能；更重要的是，不管此刻的抗争形成了多少进展，下一阶段的女人、青少年、同性恋、性多元人士等等受到压迫的主体至少不必从原点开始，而可以在新的思考和实践的基础上前进。可惜许多进步人士总是轻看情欲领域中的抗争而看不见它对彻底的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在这一方

面。赖希倒有不少洞见可以供我们思考。

赖希对情欲革命的关切并不是对马克思革命论的教条式套用，而是来自于他对苏联 1920 年代性革命的反省（注 41）。当时许多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总认为经济领域有关「生产」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彻底的革命，而其他领域（如性别或情欲方面）的变革充其量也只是从属的、片面的、奢侈的、不太重要的；因此这些人对经济生产以外的社会脉动抱持着漫不经心的态度，或者用各种阶级色彩的大帽子来扣它们（Reich, *The Sexual* 160）。但是赖希相信，革命不能忽略存在在群众心理中的「历史的主观因素」（subjective factor of history）（Reich, *The Sexual* 174），因为这种心理状态——也就是在一夫一妻父权情欲生产关系中养成的情欲匮乏状态和威权人格——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革命的动力，而且这个心理情欲的结构并不完全随同经济力起舞，而是形成一个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独立力量」（Reich, *The Sexual* 188），甚至可以左右一个革命的走向。「父权家庭为所有建立在威权原则上的社会秩序提供了一个结构的和意识形态的繁殖地」（Reich, *The Sexual* 161）。因此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家庭情欲结构一定是一个重要的改造节点（注 42）。

从理论的角度来说，赖希在社会革命的架构内首度认识到情欲（性）的物质性（the materiality of sexuality），以及物质的情欲基础（the erotic/sexual basis of the material）。复杂化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力（下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截然二元分野（注 43）。赖希严正的指出，「一个社会的情欲过程（sexual process）一向就是其文化过程（cultural process）的核心」，也就是再生产

(reproduction) 的核心。换言之，情欲领域中的革命就是再生产的革命；「性革命就是社会文化重新结构 (re-structuring) 的客观表现」(Reich, *The Sexual* 160)，而父权家庭及其相关的人格心理情感性欲绝对是这个革命的主要场域。

换句话说，以苏联的性革命为例，赖希认为是强烈的家庭情感影响了革命的执行者，因而使得革命的果效无法全面展开；这个深刻的认识也为我们思考美国百年来的性革命提供宝贵的洞见。毕竟，新的社会连结方式总是新的、刚建立的、甚至尚未生根的，可是原有的家庭情感及其构成的人格结构却是根植于日常的每日生活活动仪式中。每一个习惯动作及情绪反应都可能促进并巩固主体在原有社会结构中形成的自我定位。因此，一个革命的真正效应除了改变社会的经济结构之外，一定要改变其人格结构的再生产方式，改变那些维系现有人格心理运作的日常生活与惯常反应，也就是改变养成这些日常生活与惯常反应模式的一夫一妻异性恋婚姻家庭结构。赖希甚至明确的指出，革命的效应不是由它建立了多少新的立法而定，而是由人民是否经验到崭新的、革命的生活方式和内容而定 (Reich, *The Sexual* 174)。因此，社会革命不能只是经济与政治层面的重组，它必然要包含人格结构和和情欲心理的重组，才不至于一时进步，终究倒退。可借苏联的革命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深刻的意义，反而用阶级的帽子扣上推动性革命的努力，使得苏联的整个革命功败垂成。因此赖希才会沈痛的说：「真正的悲剧就是当革命运动开始维护反动的、庸俗的观点，并称呼性革命者为『小资产阶级』的时候」(Reich, *The Sexual* 160)。

赖希在 1920 年代苏联性革命反挫的例子中所学到的宝贵功课是：性革命决不只是相关现有既存的、已经带着各种文化人格心理包袱的抗争主体及其实践，更重要的是如何切断体制再生产自我的管道，也就是解放一夫一妻家庭的情欲压抑，挑战此刻的性的部署及其中的权力关系，积极改造生产未来将承担体制的新生主体。

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全面扩展当然会包含了情欲生产力的开展和性意识的扩散普及，这个新开发出来的动力和空间也当然有可能如傅柯所言使得性的权力部署更加细致化，但是对抗这个趋势的策略绝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努力回复情欲白色恐怖的禁绝状态，而是要像傅柯一再强调的，去挖掘串连已经存在的零散的抗争点，平反被压抑的知识和论述（*subjugated knowledges and discourses*），暴露性部署的松散和矛盾。这也就是说，情欲生产力能否为情欲上受到压迫的主体形成抗争式的支援，能否彻底的改造既有情欲生产关系的单一及权力不平等，能否被串连起来摇撼迂回相连的其他压迫关系，都还要看运动者如何挪用转化资本主义的情欲生产力，如何呵护那些已经在此刻片面或局部突破情欲生产关系的畸零主体以扩散她们搅扰体制的效应和力量，如何积极介入通俗媒体中不断复颂的情欲常识、家庭意识形态中的性养成、青少年次文化的情欲实践、性与家庭的相关法律及制度常规、性领域中的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性（医）学及性（心理）研究等学术及论述生产、以及在现阶段愈来愈强大的知识／权力场域中形成的性教育（注 44）。

如果说台湾现阶段澎湃进行的性革命有机会为情欲弱势创造什么发展的空间，开拓什么情欲方面的资源，改变什么现有的不平等分

配，那么，对性革命的历史和理论进程的活络认识和诠释，实在是此刻迫不及待的工作。

注释

- (注 1) 本文是笔者对「情欲政治」(erotic politics, or, politics of sexuality) 所写的「导论三部曲」的第一篇。第二篇〈色情与女／性能动主体〉在 1996 年 5 月 3 日第 20 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中宣读，定稿则发表于《中外文学》第 25 卷第 4 期，1996 年 9 月，6-37 页；第三篇则是〈从左翼到酷异：美国同性恋运动的「酷儿化」〉，《性／别研究》第 3-4 期合刊，1998: 260-299。。
- (注 2) 研究者一向就注意到，赖希晚年大量修订其早年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因此对于了解他的思想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是基本上，赖希尝试融会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倒是不争的事实。赖希觉得个人心理问题有其社会源头，同时，他也觉得精神分析理论只在个人范畴之内打转，没有看见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在个人的性生活和性态度甚至人格结构上具体的操作以便再生产适合本身需求的劳动力，故而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来显示社会组织方式对个人心理的细致塑造。但是赖希又觉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只有宏观的眼界，而没有思考在社会条件中形成的个人心理和情欲结构如何阻碍、或延缓、或有助于社会生产的操作以及再生产体制的维系，故而也需要精神分析的理论来实地检视社会文化在个人心理的沉淀如何反过来使得生产模式得以成为可能。由于这个关切，赖希才对 1920 年代欧洲及苏联的性

文化变革充满兴趣，期望了解其中各种力量的运作。本文在此沿用的是 1945 年出版的英文版如《性革命》。

- (注 3) 赖希在这里的分析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家庭都经历了这些冲击（个别家庭和个人当然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变迁发展），而是说整体的社会结构中有这些新的趋势和现象。
- (注 4) 赖希认为美国的婚姻制度崩解速度最快，是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最高，因而在「情欲经济」(sex-economy) 上创造了最大的矛盾，一边是高度严格要求禁欲的清教徒精神，另一边却是强制道德 (compulsory morality) 在社会变迁中的逐步崩溃。事实上，赖希也暗示，清教徒式的情欲生产关系正是被强制道德所压制不住的情欲生产力冲垮的 (Reich, *The Sexual* 142)。
- (注 5) 有些学者质疑「性革命」的说法，认为「革命」包含了一个前傅柯式的历史发展观念 (Seidman, *Embattled* 22)。但是连质疑者也都承认，使用「革命」这样的语言，并不一定要包含什么实证式的全面翻转现象，而可能只是代表了性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而且在动员群众、创造反叛的象征上，有其重要的修辞策略的意义 (Seidman, *Embattled* 21)。傅柯虽然强调抗争点的零散、流动和短暂，但是他也承认有巨大激进的翻转可能：「毫无疑问的，是那些（散见于社会阶层和个人生活中的）抗争点被策略性的串连符码化，使得革命成为可能」(Foucault 96)。而所谓社会运动就正是要创造并实现这个可能，因此本文对美国百年来性革命的「重新描

述」(redescription)并不在于「发掘历史的真相」——那些言之凿凿说性革命是不可能的空想、已经被女人视为错误而唾弃、美国人现在倾向回归家庭之类的断言，倒常常宣称自己是知道「历史真相」的。我的立场比较靠近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 Richard Rorty：现实总是在论述中被经验、被建构的，而任何描述都只是发言者所选择的隐喻(chosen metaphoric)(Rorty 39)，也因此只不过呈现了发言者引以理解和建构世界的角度而已。而我们之所以不断重写历史、重述现实，正在于开拓另类描述的空间，也就是以「自我创造」(self-creation)的隐喻来取代「发现史实」(discovery)的隐喻(Rorty 40)。

(注 6) 在这里，我的语言有可能使读者误以为这两个概念也有什么单一本质(monolithic)，不过我在下面的历史分析中会具体显示，美国历史上两次性革命是由愈来愈复杂的运作因素和力量促成的。在这篇论文中，情欲生产力和情欲生产关系将只是一组启发性(heuristic)的工具，以帮助我们串连各种敌意以及各类与性体制矛盾的实践，以形成对立或反对阵线，并且和马克思主义论述串连。

(注 7) 关于「性的部署」的观念，参考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trans.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1980)，特别是第四部份的后面两章。我对这个很有启发性的概念也做了比较宽广的、比较马克思主义式的诠释。

(注 8) 如 D'Emilio & Freedman, Epstein, Faderman, 和 Seidman。

(注 9) 这两次「性革命」所涵盖的层面当然包含了「性」和「性别」方面的各种变迁，本文将比较聚焦于性领域内的变化，而以性别为背景。

(注 10) 事实上，也只有那些自我定位为场外裁判的人，才会热衷于用一竿子打翻船的方式来评断一个运动或思想革命是「失败」（或「成功」），仿佛一旦决定了功过，就可以把其中的一切抹上本质主义式的色彩，然后轻易的全面拒斥（或全心拥抱）个中的一切。可是，就社会运动、就改变世界的出发点而言，真正要关心的恐怕应该是如何转化使用串连那个运动或思想革命中的各种论述或历史资源，来操作此刻的意识形态场域，扩大此刻的运动能量。

(注 11) 研究性与生产模式在西方社会中互动关系的许多学者都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量扩散之前，家庭的结构和功能是经济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家庭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劳动的生产活动绝大部分在家庭之内进行，因此性别分工并不十分明显，家庭成员合作生产每日所需，互相依赖存在。这种生产体制并没有提供在家庭之外的其他谋生方式，因而使得个人的人生选择十分有限，情欲活动的模式局限于维系这样的家庭和生产模式，也就是局限于服务婚姻，而由家长全权决定。性和婚内生殖密不可分，因为那是唯一可能大幅增加劳动力也就是增加家庭财富积累的方式。历经 17、18、19 世纪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把许多劳动生产活

动移至家庭之外，提供了雇佣劳动的机会，家庭成员因而被吸引离开了原本自给自足但此刻在生产力竞争中居于劣势的家庭生产模式。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减弱。女人在家庭中的工作窄化至子女之照料，同时，幼年人口的经济贡献力因着劳动的职业化而延后或减弱，生育子女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这些发展都可以部分解释 19 世纪末对节育的关注。事实上，学者认为到了 20 世纪初，家庭的经济功能已被其情感功能取代，因此性也不再局限于生殖功能之内了（D'Emilion 6-7; Epstein 156-158; Reich, *The Sexual* 135）。

（注 12）有些游乐设施的广告词明白的宣告其情欲性质。例如：「爱之桶」的广告词说：「听过小木屋宾馆吗？『爱之桶』比它浪漫十倍！」（意译）。「炮弹飞车」的广告词说：「她会大声尖叫，飞身躲入你怀中吗？是的！一定会！」（D'Emilio & Freedman 196）。

（注 13）值得注意的是，D'Emilio and Freedman 在叙述主体在情欲实践力上的差异时，并没有以区分高下的方式来断言阶级因素全面决定了情欲满足的程度，也没有断言当时的情欲生产力扩张对中产女人比较有利因此不值得推广等等。阶级（以及另外许多因素，如婚姻状态、居住区域、家中排行、相貌身材、年龄辈分等）当然会影响到情欲资本的大小与运用；正如它在教育、就业、从政等方面也同样会影响个别主体施力的机会与结果。但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是：为什么许多人面对主体的阶级差异，仍然对各种方面的解放运动热情支援，

不遗余力，却唯独对情欲领域的解放运动特别有保留，而且时刻祭出阶级差异来劝说大家驻足不前？「否性（sex-negative）文化」（Reich, *The Sexual* 25; Rubin 11）和「情欲沙文主义」（Rubin 32）在这一点上的同时运作，值得运动者进一步反省。

（注 14）世纪之交的情欲革命可以从另一个迹象观察到。金赛的性学研究显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男人在婚姻体制之外的情欲出路多半只有找妓女，但是战后的现象是，男人转向非妓女的比例大幅扩张（Kinsey et. al. 300），不再严行情欲规范的 20 年代女人甚至赢得了「新女人」（New Woman）的封号（D'Emilio & Freedman 190）。

（注 15）不少历史观察者都指出同性恋身分在此刻浮现（Bullough 177; Weeks 90），但是我在此处更关心的是阶级、性别与认同身分在此时刻的汇集发展。

（注 16）节育从十九世纪起就一直是个引发焦虑的社会议题，因为各种节育的措施不但意味着人口的减少，更意味着女人首次有了机会决定自己的生命有多大一部分要投注到养儿育女的事业或者其他的人生目标上。这种蕴含自主选择权不论对男人或女人而言都是一大挑战（Epstein 158-159）。

（注 17）德国的著名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也曾在 1913 年呼吁工人进行「生育罢工」，以全面拒绝生产新的工人来企图终结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Asbell 30）。

（注 18）这种优生的考量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种罪

行被揭露。才逐渐在许多中产人士中减弱，继之而起的节育说词就变成了所谓的「人口控制」(population control)(Grant 42)。

(注 19) 美国本土生产性学研究的男女医学人士包括 Katherine Bement Davis, Prince A. Morrow, Gilbert V. Hamilton, Latou Dickinson, Cleia Mosher, Max J. Exner 等(参见 Bullough)。另外，同一时间内，透过中产妇女的支持，专业的妇产医学也逐步取代传统的产婆，把女人的生育过程医疗化，从家庭和社区移往专业空间中(如医院)。这个医疗权的争夺战牵涉到复杂的阶级和种族问题，也凸显了性革命的复杂动力学(Riessman 126-130)。

(注 20) 这些性学家对于性的热情正面描述使得评论者都称呼他们为「性狂热份子」(sexual enthusiasts)(Robinson 3)，可见他们在性学领域中的突破性，绝不亚于那些积极抗争既有体制的社会运动者。

(注 21) 1918 年 Marie Stopes 推出 *Married Love*，1926 年 Theodoor Hendrik van de Velde 在德国和荷兰同时推出 *Ideal Marriage*，两本都在美国成为畅销而且长销的婚姻手册。

(注 22) 1920 年代欧洲各国进步人士也曾透过各种性质改革的组织，如「性改革世界联盟」及「德国保护母亲暨性改革协会」，来推动性道德及文化革新，其中还包括苏联 1917 年革命之后，新社会对堕胎和同性恋的诸多开放、对妇女经济地位的改善以及婚姻家庭制度的松弛、对青少年和儿童性教育的创

新学程等等新措施及政策。1920 年代欧洲的性革命承袭了当时左翼的进步思潮，把性视为社会文化的物质基础之一，也因而把性改革当成社会改革的重要环节，宣称追求更公义、更理性、更现代的性道德与性文化，以减轻强制式的禁欲为个人生活带来的痛苦压抑，并消除双重标准的伪善式性道德在社会中造成的恶果（如嫖妓、性病等等）。对同时期的赖希而言，1920 年代欧洲各国的性改革运动者虽然有其进步性，也具体的为消除非理性的性道德压迫尽过心力，但是。赖希坚定的指出，这些性改革运动者注定走不了多远，因为他们共同有一盲点：他们都还死守婚姻制度为最后底线：换句话说，性改革者只希望在不动摇婚姻制度的前提之下，对当时的性道德做局部的改革，以建立一个新的、比较理性的新道德秩序，她们所作的努力充其量只是调整了婚姻的内容和性质以保存婚姻体制而已（Reich, *The Sexual* 52-73；亦可参考 Seidman, *Romantic* 73-81）。

（注 23）例如，就业机会的紧缩使得许多女同性恋在经济上无法单身独立生活而被迫进入异性恋婚姻，可是同时有些女同性恋也策略的调整情欲生活，以某种双性恋式的妥协模式来维系自己的同性恋身分（Faderman 95）。

（注 24）内分泌方面的研究动力，很大一部分来自对繁衍生殖过程的关注，还有一部分则来自男性医学人士对恢复自身男性雄风的个人兴趣（Bullough 125-126）。

（注 25）二次大战后。国家安全成为首要考量，右派份子如麦卡锡等

人利用恐共心理，对许多政治异议份子大加迫害，例如 1954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获悉金赛的性研究中心遭受调查之后就立刻终止了对金赛的经费补助 (Segal, *Straight* 88)。这种氛围对同性恋等性异议份子亦不放松，1947 到 1950 年间军队和政府单位中就开除了将近五千名同性恋身分的员工 (Faderman 140)，艾森豪总统并且在 1953 年下令，以后政府的雇佣程序中必须查明申请者的性偏好取向。冷战阶段中社会大众的不安心理遂以排挤异己作息抒解，造成了对同性恋极为不利的社会氛围 (D'Emilio & Freedman 291)。不过，同性恋仍在如此的劣势中推动自我意识和认同，左派同性恋就在此时成立 The Mattachine Society，女同性恋则组成了 Daughters of Bilitis 的联谊组织，作为下一阶段运动组织的前身。

(注 26) 过去有许多女性主义者对这个趋势的诠释是：花花公子哲学为男人提供了逃避家庭责任的借口，这对女人绝对是百害而无一利。这个诠释没有思考的是。如果女人要打破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和家庭体制，开拓新的人生道路，那么她们对那些已经在拒绝支撑家庭体制的做法——包括女人逃家（不婚、出轨、第三者）或男人不养家（外遇、离婚）——也必须有更细致复杂的分析，而不能一竿子打翻船的全面加以批判。

(注 27) 历史学家认为 1960 年代性革命的号角是由两本重要的女性著作吹响的。其中较为女性主义者乐道的是 1963 年 Betty

Friedan，愤慨描绘中产家庭主妇生命荒原的《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另外一本就是这里所说的、更早一年出版而且轻松决断的一举将婚姻及女性迷思彻底撇弃的《性与单身女郎》（Ehrenreich et. al. 56）。

（注 28）1950 年代初的冷战高峰是美苏之间在古巴的剑拔弩张，末期则转为两国的太空争霸战，1957 年苏联成功的发射 Sputnik 太空船，美国惊觉落后遂投入大量经费和奖助学金来补助大学的扩张，希冀透过教育来提升竞争力。这个「教育的民主化」为原本与高等教育无缘的女性和少数民族成员开辟了自主自立的道路（Faderman 197）。

（注 29）「意识觉醒」这个名词是纽约市左翼女性主义者 Kathie Sarachild 所创，但是这种活动的灵感来源则是 50 年代全球反帝、反殖运动中发展出来提升人民自觉的团体活动；Sarachild 曾经参加过的民权运动在南方黑人群象中就曾有「细诉真相」（tell it like it is）的做法，中共在农民中则推动过「忆苦思甜」，瓜地马拉革命游击队也使用过类似策略来提升群众意识（Echols 83-84）。

（注 30）此刻另外两本以通俗语言撰写的经典着作则是 Alex Comfort 的 *The Joy of Sex*（1972）以及 Nancy Friday 的 *My Secret Garden*（1973），前者以丰富露骨图片和明确的文字描绘，具体教导读者如何创意的享受性爱，后者则展现了女性性幻想的狂野和主动，直逼任何社会的道德禁忌。这类着作的风行都宣告了性医学再也不能垄断性的论述。

(注 31) 口服避孕药的研究和实验推广过程充满了历史的偶然和意外发展，可参考 Bernard Asbell, *The Pill: A Biography of the Drug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以及 Linda Grant, *Sexing the Millennium: Women and the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Grove, 1994), 第 3 章。

(注 32) 例如前面提过的「意识觉醒」(consciousness-raising) 活动，目的在透过个人的经验叙述来发展阶级意识和姊妹情谊。她们相信女人的觉醒不是用什么理性或教条的教育来认识女人的处境，而是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么一来，「一般人民的智慧」既然高过别的运动（特别是美国当时由男性主导的进步运动）已经建立的理念，那么就需要尽量鼓励个人提供经验，集结以作为知识的基础。这个做法后来也被同性恋解放运动采用，作为壮大主体的活动形式 (Echols 82-85)。

(注 33) 这方面的分析可参考 Faderman (215-245) 及 Smyth。

(注 34) 1960 年代逍遥探索的那一代年轻人在 1970 年代已成为必须面对现实生活的青、中年人，她们之中有许多人已经有了稳定的社会地位和成就，或者想要结婚但找不到可以共同建立平等关系的伴侣，想要生育后代而已经晃过了生育的年龄。不同的年龄及其相应的社会角色，使得许多人的心态也很不一样了 (Stacey 227)。而不巧的是，她们所面对的美国现实正好是 1970 年代后期的危机四伏和挫败连连，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后来雷根保守政权对这些人产生广泛的吸引力。

- (注 35) 1980 年代前后出现了一大批拥护家庭、回归家庭的作品，把女性主义者刻划为肇始家庭解体的元凶，例如 Berger & Berger 及 Kramer。言论风气所及，甚至有些左派学者也有相同的论调，例如 Illich 及 Lasch。
- (注 36) 在这些发展过程中，基进的左派女性主义者已经意识到妇女解放运动的中产化。因为此时的「妇女解放运动」已成「妇女运动」(Women's Movement)，「女性主义变成了一种改良主义的政治」(Willis, *No More* 118)；原本高举女性情欲自由和女性自决的首要议题——堕胎权，也已经在运动的语言中变成了温和的「人生选择」(choice) (Willis, "Foreword" 7)；而要求女性得力壮大并且对体制进行全面集体的抗争，变成了一系列自我救援式的疗伤组织，例如强暴救援及辅导中心、家庭暴力受害女人的中途之家、女人的健康诊所等等。虽然这些机构有其及时救助个人的重要性，但是它们需要长期的支援和经营，更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资源。而当性伤害层出不穷，社会环境的改造速度有如牛步时，各种来自父权社会的反挫和来自女人本身的丧志，都使得性革命所带来的脉动受到极大的耗损。
- (注 37) 有意思的是，领导反色情运动的主要是白种中产女性，而非那些在体制中受害最深的少数族裔女性 (Segal, *Straight* 62)。
- (注 38) Susan Faludi 的《反挫：谁与女人为敌？》(*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 就记录了许多这

方面的迹象。

(注 39) 例如 Betty Friedan, *The Second Stage* (New York: Summit, 1981) 和 Germain Greer, *Sex and Destiny: The Politics of Human Ferti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4)。

(注 40) 这个会议的相关论文可参看由 Carole S. Vance 编的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注 41) 苏联在 1917 年革命之后，曾经尝试推行一连串性革命的措施，来改变有关婚姻、离婚、节育、同性恋、青少年生活、及儿童教养的社会实践，以当时的历史眼界而言是十分进步的做法，可惜没有多久就在各方守成势力之下倒退，赖希在《性革命》的后半段对这一段历史有颇为沈痛的检讨和分析。他认为当时有很多人抱持着非常简单的经济观点，「以为随着资产阶级的败亡和苏联新颁布的性立法，性革命就『已经完成大业』，或者只要无产阶级一掌权，性的问题就自然的解决了」(Reich, *The Sexual* 187)。赖希认为这些人的大错误正在于他们只看重立法，而忽略了情欲领域的(半)自主性：「任何对历史发展所作的研究，只要它以为群众的心理状态仅仅不过是经济过程的产物(product)，而没有认识到这些心理状态也同时是经济过程的动力(motive force)，那么这种研究还算不上是有革命眼光的」(斜体字写本文作者所强调；Reich, *The Sexual* 174)。

(注 42) 就 1980 年代以来性／别解放运动所遭遇的挫折来看，家庭显然还是最重要的争战场域，情欲革命的果效似乎与家庭结

构的革命息息相关。傅柯曾特别指出，从 18 世纪以来，家庭单元就是「性的部署」的最主要场域，包括女性身体、儿童性、生育、及各种变态等等主要的性轴线部署策略，都在家庭中的「夫妻」和「亲子」两个面向上找到它们最坚实的支撑：「性的专属发展场域就是家庭」(Foucault 108)。傅柯的兴趣是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指出「性的部署」在家庭中运作所形成的各种矛盾张力，如乱伦禁忌与情欲灌注的共生；但是家庭「性化」的内容和结果在个人具体心理的层次上倒底是何面貌，这样的主体形塑对社会运动又有什么影响，傅柯并未处理。在这方面，我们倒可以由赖希的性革命论得到一些启示。赖希并非下是笼统抽象的宣告性欲的社会形成，而是更深一层由微观的角度指出，一夫一妻父权婚姻家庭中的管教式情欲调教，根本无助于主体快感能力（orgasmic potency）的养成，也因而无助因愉悦开放的人格养成。赖希在研究当时甚嚣尘上的法西斯心态时，逐渐认识到一夫一妻婚姻家庭是促使个人快感能力薄弱、情欲经验匮乏、以致于无力创造愉悦而只能养成权威人格的主要场域（Reich, *The Sexual* 95）。赖希指出，一个强烈（而且强迫）要求婚前贞洁和婚后忠贞的一夫一妻家庭，事实上正是威权体制的缩影，也是养成权威人格的温床（Reich, *The Sexual* 75-82），在这种家庭中运作的最主要权力关系是伴随资本主义而发展出来的「身体私有制」以及按着父权逻辑来执行的「父亲权威制」。「身体私有制」使得夫妻之间强

制排他的性交关系在实质上早已丧失自发的性和愉悦，而多半是维系体制的例行活动而已；「父亲权威制」则勾画出父权的一夫一妻婚姻家庭中，父亲与妻子儿女间的赤裸权力面貌以及父母对子女的性管制。赖希则认为，这两种所谓的「强制道德」(compulsory morality)构成了家庭人际关系最主要的运作模式，而嘲讽的是，环绕着家庭的意识形态再现却是最甜蜜温馨的图像和描绘，以至于不管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如何苦闷无趣沈寂，不管孩子的人格发展如何被性焦虑和性压抑所构成，人们还是不自主的合理化其中的痛苦，习惯性的觉得有义务巩固这个制度。而在这种环境中所养成的自欺、伪善、敌意和怨愤也往往在无意识中啃噬家庭成员的心灵，使孩子不但无力创造自己的愉悦，连对别人的性愉悦也不是忌妒就是打压，而且倾向唯唯诺诺、胆怯退缩、保守内敛，但却同时迷信领袖、惧怕权威、甚至残暴易怒。这些——正是权威人格的特质，也正是纳粹之类的威权政治体制需要的臣民，其对情欲的矛盾畏惧但又自责压抑，更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制度需要的严谨劳动主体 (Reich, *The Sexual* 82)。若不面对并改造这种人格心理的生成，性革命的效应往往只是一时的、有限的、个别的突破现象，而不能彻底切断旧情绪、旧习惯、旧心理对旧制度的依恋和支撑。这种人格心理的固着一旦遭遇挫折的情势就立刻退缩转向，渴望回到某个安全的、不引发变动的位置上去。这个体认使得赖希视婚姻家庭为性革命的首要场域。赖希在这里指出了体制内

的性医学和性教育专家们极力回避的一个事实：一夫一妻婚姻家庭固然有可能是关爱和依赖的小屋，但是它也同时是压迫与限制的牢笼。婚姻义务和家庭中的权威只会创造出一个个无力以自主的爱性来经验人生、只想靠着婚姻的道德与法律制度来强取他们希望享有的安全感、归属感、占有感的怯懦人格（Reich, *The Sexual* 129）。赖希本人则主张用自由自在，不建立在占有及监控上的自然结合（及分手）来取代强迫式的婚姻制度，彻底的改变人际结合的方式相形态，借以改变在父权一夫一妻家庭中生成的情欲匮乏和权威人格心理结构。

（注 43）不屑性革命的左派总是强调要先谈情欲的「物质基础」，好像情欲是什么依赖着某种物质基础而存在的次要东西，而那些「物质基础」则有着自我独立的优先地位。赖希所关心的则是那些使得物质基础得以持续运作的「情欲基础」——在这里指的特别是婚姻家庭所养成的心理情欲结构。更有趣的是，赖希同时强调，这个情欲基础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物质的，他在《性革命》的前半部指出，情欲的发展意味着物质世界的重组和资源的分配，因为性愉悦能力的培养需要文化物质基础。换句话说，性当然不只是个人选择什么生活方式的问题，而是个牵涉到社会资源分配的问题。赖希很明确的指出，对一个经济能力有限的青少年而言，她的情欲如果要能自在的得到满足，这不只是她的性欲自由的问题，她同时需要隐私权、需要属于自己的空间和经济能力、需要避孕的

知识与资源、需要肯定面对性事而且有能力爱她的性伴侣、需要开明支援的父母、而且绝对需要一个正面看待性的社会环境 (Reich, *The Sexual* 15)。不过，由于在现有的婚姻家庭制度中，这些情欲资源的掌控主要是由父母来进行日复一日私密生活的监管和性道德观的灌输，因此赖希对父母以性控制来建立自身的权威并挫伤孩子的人格感到深恶痛绝。更值得台湾本地进步运动人上深思的是，赖希在提到情欲解放需要物质条件的时候，从不是为了消极的指出青少年情欲自主之不可能或困难，也不是忧心忡忡的担心情欲解放有其经济能力和阶层限制；相反的，赖希正是要用这种对物质条件的强烈关注和具体要求，来指出青少年在情欲上的处境是代间压迫的问题，是性别压迫的问题，因此也是一个需要用更激进的情欲社会革命来改变的状态。

(注 44) 1960 年代末期到 1970 年代初期性革命的浪潮中，美国的教育系统开始考量推动性教育时，女同志就已经在异性恋主导的妇女运动中清楚的看到（性）教育对再生产自我的重要，因此提出了非常前瞻的要求：「所有的性教育教程都必须包含女同性恋情欲，作为有效的、正当的性爱和性表达方式之一」（Echols 215），像这样前瞻激进的运动策略在台湾本土尚有待生产。

參考書目

- Adam, Barry D. *The Rise of a Gay and Lesbian Movement*.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Twayne, 1995.
-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Trans. by Ben Brews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 Altman, Dennis. "Political Sexualities: Meanings and Identities in the Times of AIDS." *Conceiving Sexuality: Approaches to Sex Research in a Postmodern World*. Eds. By Richard G. Parker and John H. Gagnon. London: Routledge, 1995. 97-106.
- Asbell, Bernard. *The Pill: A Biography of the Drug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 Bailey, Beth. *From Front Porch to Back Seat: Courtship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Baltimore: U of Maryland P, 1988.
- Berger, Peter & Brigitte Berger. *The War Over the Family: Capturing the Middle Ground*. New York: Anchor, 1983.
- Bremmer, Jan. *From Sappho to De Sade: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1991.
- Bullough, Vern L. "The Development of Sexology in the US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cience in the Bedroom: A History of Sex Research*.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4. 303-322.
- D'Emilio, John. *Making Trouble: Essays on Gay History, Politics, and the Univers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D'Emilio, John & Estelle B.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8.
- Dimen, Muriel. "Power, Sexuality, and Intimacy." *Gender/Body/Knowledge: Feminist Reconstructions of Being and Knowing*. Eds. by Alison M. Jaggar & Susan R. Bordo.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P, 1989, 1992. 34-51.
- Echols, Alice. *Daring To Be Bad: Radical Feminism in America, 1967-1975*.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9.
- Ehrenreich, Barbara. *The Hearts of Men: American Dreams and the Flight from Commitment*. New York: Doubleday, 1983.
- Ehrenreich, Barbara, Elizabeth Hess, & Gloria Jacobs. *Re-Making Love: The Feminization of Sex*. New York: Doubleday, 1986.
- Epstein, Barbara. "Family, Sexual Morality, and Popular Movements in Turn-Of-Century America." Snitow et. al. 155-168.
- Escoffier, Jeffrey. "Sexual Revolu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ay Identity." *Socialist Review* 15 (1985): 119-153.
- Evans, David T. *Sexual Citizenship: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1993.
- Faderman, Lillian. *Odd Girls and Twilight Lovers: A History of Lesbian Life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1991.
- Faludi, Susan. *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Crown, 1991.
- Fine, Michelle. "Sexuality, Schooling, and Adolescent Females: The Miss-

- ing Discourse of Desire." *Disruptive Voices: The Possibilities of Feminist Research*.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1992. 31-59.
- Fiske, John.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 Foucault, Michel.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Trans.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1980.
- Fout, John C. & Maura Shaw Tantillo, eds. *American Sexual Politics: Sex, Gender, and Race Since the Civil War*.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90, 1991, 1992, 1993.
- Freedman, Estelle B.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Homosexuality in the US." *Socialist Review* 25.1 (1995) : 31-46.
- Friedan, Betty.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Dell, 1963.
- . *The Second Stage*. New York: Summit, 1981.
- Grant, Linda. *Sexing the Millennium: Women and the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Grove, 1994.
- Green, Jonathon. *It: Sex Since the Sixties*.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93.
- Greer, Germaine. *The Female Eunuch*. New York: McGraw-Hill, 1970, 1971.
- . *Sex and Destiny: The Politics of Human Ferti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4.
- Haag, Pamela S. "In Search of 'The Real Thing': Ideologies of Love, Modern Romance, and Women's Sexual Subjectivity in the United

- States, 1920-40." Font & Tantillo 161-192.
- Haste, Cate. *Rules of Desire: Sex in Britain World I to the Present*. London: Random House, 1992.
- Hekma, Gert. "A History of Sexology: Social and Historical Aspects of Sexuality." Bremmer 173-193.
- Illich, Ivan. *Gender*. New York: Pantheon, 1983.
- Irvine, M. Janice. *Disorders of Desire: Sex and Gender in Modern American Sexology*. Philadelphia: Temple UP, 1990.
- Jeffreys, Sheila. *Anticlimax: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New York UP, 1990.
- Jenness, Valerie. *Making It Work: The Prostitutes' Rights Movement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3.
- Kinsey, Alfred, et. al.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 Philadelphia: W. B. Saunders, 1953.
- Kon, Igor S. *The Sexual Revolution in Russia from the Age of the Czars to Today*. Trans. by James Riordan. New York: Free P, 1995.
- Kramer, Rita. *In Defense of the Family: Raising Children in America Toda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 Lasch, Christopher. *Haven in a Heartless World: The Family Besiege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 MacKinnon, Catharine A.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9.
- Millett, Kate. *Sexual Politics*. New York: Doubleday, 1970.

- Patton, Cindy. *Inventing Aids*. London: Routledge, 1990.
- Peiss, Kathy. "'Charity Girls' and City Pleasure: Historical Notes on Working Class Sexuality, 1880-1920." Snitow et. al. 127-139.
- Porter, Roy & Milulas Teich. *Sexual Knowledge, Sexual Science: The History of Attitudes to Sex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4.
- Reich, Wilhelm. *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 Trans. by Vincent R. Carfagno.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70.
- . *The Sexual Revolution: Toward a Self-Regulating Character Structure*. Trans. by Therese Pol.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45, 1962, 1969, 1974.
- Riessman, Catherine Kohler. "Women and Medicalization: A New Perspective." *Inventing Wom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Gender*. Eds. by Gill Kirkup & Laurie Smith Keller. London: Polity, 1992. 123-144.
- Robinson, Paul. *The Modernization of Sex: Havelock Ellis, Alfred Kinsey, William Masters and Virginia Johnson*. Ithaca: Cornell UP, 1976, 1989.
- Rorty, Richard.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89.
- Rubin, Gayle.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Eds. by Henry Abelove, Michele Aina Barale, & David M. Halperin. London: Routledge, 1993. 3-44.

- Sayres, Sohnya, Anders Stephanson, Stanley Aronowitz, & Fredric Jameson. *The 60s Without Apology*.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4.
- Schur, Edwin M. *The Americanization of Sex*. Philadelphia: Temple UP, 1988.
- Segal, Lynne. *Straight Sex: Rethinking the Politics of Pleasure*. London: Virago, 1994.
- Segal, Lynne & Mary McIntosh, eds. *Sex Exposed: Sexuality and the Pornography Debate*. London: Virago, 1992.
- Seidman, Steven. *Embattled Eros: Sexual Politics and Ethic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 *Romantic Longings: Love in America, 1830-1980*.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 Smyth, Cherry. *Lesbians Talk Queer Notions*. London: Scarlet P, 1992.
- Snitow, Ann, Christine Stansell & Sharon Thompson, eds. *Desire: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London: Virago, 1983.
- Stacey, Judith. "Are Feminists Afraid to Leave Home?: The Challenge of Conservative Pro-Family Feminism." *What is Feminism: A Re-Examination*. Eds. By Juliet Mitchell and Ann Oakley. New York: Pantheon, 1986. 208-237.
- Thompson, Sharon. "Feminism and Teen Romance: 1966-1983." Sayres et.al., 296-299.
- Vance, Carole S. "Negotiating Sex and Gender in the Attorney General's

- Commission on Pornography." Segal & McIntosh 29-49.
- Vance, Carole S., ed.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92.
- Weeks, Jeffrey. *Sex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Meanings, Myths & Modern Sexu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1985.
- Williams, Linda. *Hard Core: Power, Pleasure, and the 'Frenzy of the Visible.'*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89.
- Willis, Ellen. "Foreward." Echols xvii-xv.
- . *No More Nice Girls: Countercultural Essays*. London: Wesleyan UP, 1992.

